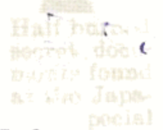

日军侵占东北罪行集之五
人圈
——伪满集团部落纪实

人圈——伪满集团部落

日军侵占东北罪行集之五



ISBN 7-205-04613-0



ISBN 7-205-04613-0/K·513

定价：30.00 元(共 5 本)

前　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的悲惨生活。侵略者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资源，残酷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东北大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主权沦丧，人民遭殃。不堪受奴役的东北人民从“九一八”事变那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以中华民族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激励后人的诗篇。

当年侵略者的暴行留给东北人民的是永久的耻辱，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讴歌东北儿女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扩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

血腥的“集团部落”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仅用几个月的时间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东北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沦为殖民地。东北人民及其抗日武装力量并没有屈服，他们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和抗日力量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和血腥“讨伐”，但仍不能扑灭东北人民的抗日烽火。事实迫使日伪当局改变了策略、转换了镇压手段，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政策。侵略者认为，实行军事镇压还不能彻底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不能维持他们的稳

固的统治。日本侵略者深知，东北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对此，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说："共匪活动的基础在于贫穷饥饿的农民，共匪正在通过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其活动以扩大势力"，"这些民众主要是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等群众团体，作为共匪活动的人力、物力基础"，"共匪仍然有顽强的抵抗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日本侵略者认为：军事镇压只不过是一种"治标"办法，而要彻底扼杀东北的抗日力量，必须实行"治本"的决策。其"治本"的措施包括推行"保甲制"，完成警备道路、通讯网等，其中最为残酷的是强行并屯，建造"集团部落"。

所谓"集团部落"，广大农民称之为"归大屯"，是日本侵略者强迫人民到指定地点集中居住，烧毁无数民房，制造无人区，隔绝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切断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对抗日武装的支援。同时，也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

1933年，"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建设方案出笼了，提出这一方案的是伪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这一建议很快被日伪当局采纳。伪间岛省（吉林省境内）在朝鲜总督府和日本驻间岛领事馆的协助下，在

延吉、和龙、珲春3县抗日力量非常活跃的地区，实行“归屯并户”，一时间，浓烟滚滚，枪声大作，侵略者用烧房、枪杀的血腥手段，驱赶民众强制迁入“集团部落”，这一年，先后有8个“集团部落”建起来。

“集团部落”一般以四五十户以上100户以下为单位。各个“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不一，大多数部落的形状呈正方形，部落的四周都筑有3米左右的围墙，围墙上面设有铁丝网，四角构筑炮台，围墙下面挖3米深的壕沟。部落内外只设4个门作为通道，每当太阳落山时，所有门全部关上，而且上锁。部落设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部落长兼自卫团长、副部落长兼保甲长。部落内建立了严格的保甲连坐制度，每个部落还常驻有日伪军警备队，或设置伪警察派出所，严密监视部落内居民的一言一行。部落严禁民众与抗日武装部队接触，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从部落内外流。

在伪间岛省各县建造“集团部落”后，日伪又在全东北各地进行推广。1934年12月3日，伪民政部以第969号训令下达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的通告，通令管下各基层普遍着手“集团部落”建设。日伪当局毫不隐讳他们建设

"集团部落"的罪恶目的，即"为了确立治安，使民匪分离"，"根除居民与'匪贼'联系，断绝其对匪团的粮道和武器弹药补给途径，并且为了作为讨伐队的基点"，使东北抗日武装部队"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歼灭之境"。一句话，日伪当局的目的就是切断抗日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然而，日伪当局为建设集团部落又提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谓"满洲偏地之农民，大部分是二三家或五六家的小部落，散居在偏僻地区与山野间，他们得不到现代国民的生活与文明的教育，而且与匪共居，无论对治安还是发展产业都有极大的不利。为了除掉这些不利，就要建设集团部落，以使这些疲弊贫困的偏远地区居民复苏，对这类地区民众给以从前实难得到的官宪的保护，以使其沐浴王道乐土的慈光，振兴民力，使民众能真正在王道治下安居乐业，真正享受到王道国家的恩泽"。以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些所谓的"恩泽"。

日伪当局规定，春季以 4 ~ 6 月，秋季以 9 ~ 11 月为集团部落建设时间。部落建设位置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匪贼时常出没或者是物资供应地点等警备要线；经济资源丰富的地点；易

于警戒及自卫的地点；易于供水，且比较干燥的地点。建设部落的次序，先是建铁丝网、土墙、水沟、炮台等设备，然后建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及临时房子，最后建家屋、水井及其他附属建筑物。而集团部落的各种工程，是以部落居民的义务劳动来进行的，一律不付经费。

在集团部落的建设中，通常是这样一种景象：泪流满面、汗流浃背的居民，在日伪军刺刀的威逼监视下，背井离乡来到他们陌生的地方，去建造他们"安居乐业"的"人圈"。

《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发布之后，当年在伪间岛省建成8个"集团部落"。从1935年开始，便在抗日武装活动的伪奉天、安东、滨江等省一些地区普遍推行。1935年共建成1 524个。1936年1937两年为高峰期，范围扩及东北全境，总计建成10 646个（详见附表）。这样，截止1939年，全东北总计建成12 565个，有500万民众被强制迁入，占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

每一个集团部落都有一笔辛酸血泪史，每一个集团部落都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法西斯集中营。这里的居民都是被日本侵略者的暴力驱赶进来的，在这里受着种种非人的折磨。这里建立了保甲连坐制，坐落在四周的炮台和铁丝网，严密监视居民的一举一动，居民没

附表："集团部落"建设状况

年度 省份	1935年前	1936年	1937年	合计	1938年预定
吉林省	760个	892个	663个	2 315个	78个
龙江省	13	910	187	1 110	46
黑河省	—	—	7	7	38
三江省	—	60	115	175	215
牡丹江省	—	—	404	404	1 018
滨江省	246	971	2 167	3 384	299
间岛省	70	29	39	138	24
通化省	—	—	103	103	76
安东省	49	134	44	227	15
奉天省	39	364	211	(614) 610	199
锦州省	—	—	23	23	28
热河省	—	—	—	38	38
兴安西省	7	279	511	797	216
兴安南省	345	556	344	1 245	165
兴安东省	—	—	—	—	—
兴安北省	—	—	104	104	76
合计	1 529	4 195	4 922	10 646	2 531

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和权利。日伪当局制定了死死管制居民的森规戒律：在部落里居住要有日伪当局发的居住证；外出要有警察机关签发的通行许可证，不得携带粮食、食盐、衣物等军需品；买东西得有购物许可证；白天不许到远离部落的地方耕种；晚上不准掩门、点灯、说话，更不准互相串门、三五成群议论和集群走路；家来客人须先报告，经过准许才能留宿……。如果居民稍有不满或违犯其中戒律，轻者遭一顿毒打，重者以“通匪”的罪名被关押、枪杀。

“集团部落”里的民众，不仅丧失了自由和权利、人身经常受到威胁和摧残，而且陷入了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苦难深渊。由于离开了原来的家园，大量土地荒芜，粮食奇缺，一年四季经常以野菜、草根、树皮充饥。1936年夏在通化县，由于苞米缺乏，部落百姓竟以苞米核做粥充饥，苞米核吃光后只好以草根树皮维生。素以豪放乐观著称的东北人，竟由于生活穷困而上吊自杀的不在少数，这在以往几乎是见不到的。到年末，通化县已有1.3万余名饥民。日伪当局也估计到，到明年春耕时期，整个县的居民“将要陷入饥饿状态”。在伪辑安县，县城以外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由农历正月已断口粮，半数居民“日无食，寝无被”。在伪柳河县，到1937年二三月

前后，粮食更为缺乏，“农民的粮食有断绝之虞”。这只是日伪当局当年的调查报告提供的一些情况，而实际情况恐怕比此更甚，部落民众受饥挨饿的状况可见一斑了。

部落民众不仅缺吃少穿，而住的条件就更为恶劣了，甚至无处安身。在前面我们曾提到，日伪当局建设集团部落时，先是建立防御、保护措施，即先建炮台、土墙、水沟、铁丝网，然后建立部落办公室，最后才建居民住房。居民被赶入“集团部落”时，居住的民房往往没有盖起来。为了安身，搭马架子，挖地窨子，住房极为简陋。屋顶多数以树皮、干草铺盖。墙壁尽是窟窿，四处漏风，不可想象，在东北冬季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居民忍饥受冻的情形。

居住条件的恶劣，使得“集团部落”内卫生条件极差，到了夏季，传染疾病四处蔓延，大量居民染上疾病，许多人被夺去了生命。据日伪统计，1936 年“通化街的传染病患者为1 132人，其中死亡 153 人；金川县为1 505人，死亡 137人；柳河县为4 385人，死亡 315 人。传染病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同时也波及到东边道各县”。如果相信日伪的这些统计数字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些患病和死亡人数就够怵目惊心了。如果日伪当局有意缩小这些数字，那么患病和死

亡的数目就不可想象了。

部落居民一方面食不裹腹，忍饥受冻，一方面还要承担繁重的徭役。修围墙、筑炮楼、铺道路都由居民承担，而且不付任何费用，完全被强制尽义务。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的部落居民，在归屯前每年负担700个劳动日徭役，归屯后每年则增为3 598个劳动日，增长了4倍还多。另外，居民还必须承受各种苛捐杂税，税种不断增加，税额不断增多，同是这个村，仅保甲税一项即由归屯前的594.6猛增至归屯后的14 365元。

日伪推行“集团部落”政策，使当时整个东北约500万人受害，占当时总人口1/7左右。他们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凡是拒绝搬迁的，都遭到残杀。日本侵略者又将原来的村庄烧毁，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居民和被焚毁的民房、土地、财物不计其数。无以数计的“无人区”，使大量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1934～1936年，伪通化县拆毁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伪汪清县罗子沟一带的“集团部落”，归屯前有7 500垧熟耕地，归屯后，由于大片土地与村庄变成无人区，荒弃耕地高达3 800余垧，占原来耕地一半以上。伪柳河县设立了199处“集团部落”，强制1.2万户居民迁人部落，并将其余房

屋全部烧毁。在伪汤原县，日伪在太平川地区大搞“归屯并户”，1936～1937年两次圈屯杀害110余名无辜百姓，有12个自然村落被毁掉，还烧毁了民众大批粮食和财物，279户被赶入“集团部落”，574户的农民被迫流落他乡。在伪桦南县，1937～1938年，日伪建立170个“集团部落”，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 000多间，被杀害或冻饿而死的群众13 000人，荒弃耕地2 100多垧，伤害牲畜4 800多头（匹）。流浪他乡的人中，除少数投靠亲友，绝大多数既无住处，又无土地耕作，难以维持生活。

1937年，美国的《美洲》杂志3月号上发表了一位名叫T·A华松的文章——《鲇川氏在寻求信用》，在这里对“满洲集团部落”实质进行了揭露：“所谓建设集团部落，实际上是日本当局为使匪民分离而强制进行的一项工作。他们对总人口1/10（应为1/7）的500万农民，烧毁其房屋，强行集中到指定的集团部落重建新家。不但不给以任何补偿，而且令其从事各种劳动奉仕，担负土墙材料费，过重的苛税负担，国防献金等等，强迫他们承担一切义务”。

由于日伪推行“归屯并户”，强化武装讨伐和推行治安肃正计划，使人民群众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原有的地方政权、民众抗日组织和

抗日武装大部分被摧毁或停止活动，给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队伍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一些抗日山林队被敌人打垮、打散。在许多重点“集团部落”，增设武装人员，配备枪支，使之成为“武装部落”。在“集团部落”和乡镇之间加紧修筑警备道路，安装警备电话，以增加“讨伐”队的机动能力。“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隔离了抗日部队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极大地限制了抗日部队的活动。敌人为断绝抗联部队粮食来源，除实行“粮食统制”政策外，还规定“集团部落”耕地的距离不许超过部落4公里。秋收时，还要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迫按数缴粮，以防止农民暗中给抗日部队留粮。敌人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对每个购买者用各种复杂手续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为严格，严防向游击区运送任何物资。不仅如此，敌人还制定了所谓经济犯条例，采取严酷的法西斯恐怖手段，凡是以经费、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供给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者，一律以“通匪”论处，并且累及亲友，连坐邻里。由于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一系列毒辣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活动。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了极端艰苦的斗

争阶段。抗联各军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后，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异常困难的形势下，抗联部队不仅经常遭受强大敌人的追击、围攻，并因敌人实行经济封锁、割断了抗日部队的给养、弹药来源，而经常受到饥饿、严寒及弹药奇缺的威胁。抗联部队为了夺得所需粮食、弹药、布匹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甚至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去换取。特别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斗争更为艰苦，部队经常在饥寒交迫的境地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周旋苦战。抗日英雄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在他的腹内竟连一粒粮食也没有发现，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但英勇的抗日联军仍然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配合全国抗战，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继续展开着英勇的游击战争。

康德也不“康德”

侵略者的目的，不只是占领侵占的土地，更主要的是驯服占领地上的人民。而当占领地上的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驯服时，侵略者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屠杀。然而愈是疯狂地屠杀，激起的反抗愈是强烈。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也想用刺刀、大炮镇住这里的人们，对反抗他们统治的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然而他们低估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未曾想到会遇到如此坚强的抵抗，反日、抗日的烽火燃遍整个东北大地，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抗日联军此起彼伏，人民群

众与抗日军队密切配合，侵略者被迫疲于奔命。于是，侵略者提出“治安第一主义”，除扶植傀儡的“满洲国”，使之成为自己的侵略工具，继续向东北增兵，同时对伪军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1934年7月，伪奉、吉、黑、热等四省警备司令部被改设5个军管区，另在伪兴安东、南、西、北各省设立警备司令部，实行分区军事统治。除伪军外，在各地普遍设置伪警察机构，扩充警察队伍，推行保甲制度。1934年3月接连颁布《警察治安法》、《暂时保甲法》，根据这两个“法令”，城乡居民被纳入牌、甲、保组织之中；实行10家连坐，人们不许有结社、集会的行为。1935年7月敌伪当局制定、推行保甲制度3年计划，根据这个计划，3年之内要在东北的115个县实行，几乎遍及东北全境。同时敌伪还根据《暂行武器取缔法》，于1934年开始大力收缴民枪，仅3个月就收缴枪械达31万支。

这一切仍不能阻止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日本侵略者继续受到各种打击，惊恐不安。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哀叹：“从满洲国治安形势的现状来看……，虽然有了一时的或者局部的好转，但是马上希望达到全面的持久化是有困难的。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匪团’组织在思

想上、政治上的加强，特别是其深刻的质的变化即‘共匪化’。”于是佐佐木到一提出：“对既往的治安工作必须命令来一次重大的转变方向”，“在‘讨伐’的同时与其他工作结合起来”。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准备，周密策划，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3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

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其主要方针是“治标”、“治本”和“思想工作”的三位一体。“治标”就是对抗日部队进行疯狂的军事“讨伐”。“治本”就是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组织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实行经济封锁，断绝抗日军民的联系，就是日伪所称的“匪民分离”。“思想工作”就是强化警察、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从根本上排出赤化思想。

“治本”—建“集团部落”是日伪“治安肃正计划”中最为残酷的一项措施。1933年，当时的伪间岛省为了使朝鲜、日本的移民不受到侵害建了8处防卫性“集团部落”，后推而广之，1934年在间岛省内建设了36处部落。于是，各省纷纷效仿，建“集团部落”“蔚然成风”。1934年12月，伪满洲国民政部发表第969号训令——《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美其名曰“查

我国幅员广阔，未尽开发荒僻之区，住户星散，以致国家之凡百设施，均欠彻底，且难发挥村屯自治之机能。长此以往，则占全国过半之农村，将永守其原始生活而无向上之术，非徒人民不能浴国家之惠泽，且国家治安亦难期其万全。欲救此弊……最适切者……莫如集团部落”。然而，正如日本人著《满洲国警察史》说：“在选择建设集团部落地点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一是为了振兴民生，一是为了治安肃正。为彻底实现后者，建设大集团部落是上策。然而，建设大集团部落的结果，将出现耕地狭小、耕地过远等情况，对农民生活上很不利。但从当时的治安情况来看，只能把治安肃正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振兴民生作为重点。”一句话，日伪所标榜的“振兴民生”只不过是光亮的外表，而大搞“匪民分离”才是真正的目标。日伪也承认，在建集团部落过程中，“许多农民以各种理由，如不愿离开住惯的土地、服有关建设的劳役、农耕地缩小等等，表示不满，对此亦费了相当的时间进行说服和斗争”。这里所说的“费了相当的时间进行说服和斗争”是冠冕堂皇的，掩盖了背后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看一看康德屯集团部落的状况就能对这种“说服和斗争”可见一斑了。

康德屯（现黑龙江省虎林县新民村），这一

带三面依山，一面傍水，地处虎林县城通往完达山的要冲。19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虎林县，全县迅即燃起抗日的烽火。虎林的百姓同仇敌忾，积极支援抗日部队，男的运送弹药、粮食，女的缝制衣服、被褥……抗日将士神出鬼没，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于是虎林也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被日伪列入了“治安肃正”的黑名单。实行“匪民分离”，大搞归村并屯也在这里实施了。康德屯因地处要冲，是抗日队伍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敌伪“讨伐”抗联的必经之路，于是，这里便受到了严格的控制。1936年秋，日本人借修筑虎林至宝清的军用公路之机，强迫这一带的百姓在公路旁修建康德屯集团部落。在此之前，这一带的百姓以散居为主，一家一户分住在山前山后的林子中，以种地或当雇工为生，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自得其乐。然而，日伪当局下了死令，限期迁到大屯里居住，不准散居，违令者以“通匪”论处，要枪毙或火烧。一时间，户户毁家舍地，哭声震天，背井离乡。

两首歌谣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愤慨心情和凄惨景象。一首是：

民国改满洲，

逼人把道修。
中间脊梁骨，
两旁挖成沟。
民工不愿干，
就用鞭子抽。
一人一张票，
然后把号溜。
再凑几个钱，
就去深山沟。
有的玩纸牌，
有的把烟抽。
有的骂鬼子，
有的编口溜。
“并村”胡扯蛋，
早晚翻满洲！

这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百姓的反抗情绪。而下面这首歌谣，则反映了归村并屯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满洲国事真新鲜，
并村集户砌土圈。
扒掉民房无其数，
砍掉树木有几万。

昔日森林一扫光，
今天到处是荒山。
“集家部落”怪事多，
男哭女喊苦连天。
时冬腊月无处住，
眼望旧房泪涟涟。
新房木、抹黑烟，
大瓦房，露着天。

限期到了，不论好房、坏房，家家是残垣断壁、火光冲天。住在东山坡的大户吕海臣，兄弟7人，共30多口人，同住一个大院套共28间房，这个大院已建了十几年，相当坚固，积累了多少年才攒下这片基业，然而依旧毁于一旦。原住太平小南山的农民曲吉成，性情耿直，曾拒绝搬迁，被毒打险些送命，没有办法，抛弃多年居住的小院，两手空空地来到康德屯。全家人起早贪黑挖个地窨子，勉强住了下来。王青元一家6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原来生活就极为困难，归屯后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被子，只好盖草包，老婆没有衣服穿，只好披着麻袋片，孩子们就只能成天光着身子了。类似王青元这种状况的在康德屯并不鲜见，当时康德屯全村200余户800余口人几乎穿得都像叫花子，家家都如同逃荒户，

不了解情况的好像来到了“丐帮”的营地。

人们来到了新村，还没有垒上自己的窝，就去修建困住自己的围墙。修围墙完全是无代价出工，每家每户都要出工，修围墙的草垡子是从几里远的草甸子一块块挖来。围墙底座宽 2 米，高 3 米，四角是高出围墙 1 米的炮楼。整个围墙呈四方形，只有一个出口，安装一个笨重的木制大门，马车可以自由出入，汽车勉强通过。大门外另建一个木制岗楼，由伪军和警察把守。

在这么几百人的部落里，最多时曾驻扎伪军一个连 100 多人，后来换岗，由 30 多名警察代替。百姓出入，都要受到严格检查，稍有心情不顺，就乱抓人，硬说“通匪”，于是借机敲竹杠，逼得人们只好贡献钱物消灾。在部落里，吃大米，有豆油是“违法”的，如被发现轻则没收，重则抓入监牢。有一位农民在虎林县城买了 30 斤豆油准备过年，被一个警长发现，马上来到他家，威胁连人带油一起送宪兵队，农民好话说尽，最后以分给他半桶油的许诺才算了解这件事。至于借婚丧嫁娶趁机揩油的更是屡见不鲜。康德屯一位做豆腐的农民要娶媳妇，一个姓宋的警察来“检查卫生”，借口说梁柁上有灰，准备“罚款”，这家知道此人曾借口检查卫生勒索过一个耳聋的宋二，并将他弄到监牢打个半死，于是

赶紧往这个警察怀里塞东西，这才打发他走了。有的警察更是贪婪得细小的东西都不放过。一个姓王的警察娶老婆办酒席，不但勒索老百姓送贺礼，而且借老百姓一个大泥盆，不仅不送还，反而要动手殴打前来索要泥盆的人，谁肯为一个泥盆惹麻烦，只好忍气吞声作罢。人们对这些恶棍恨之入骨，但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之勒索而不敢招惹。

部落里，农民还要承受繁重的无代价的劳役，农民要经常拉砂石垫道修公路，打草喂军马，还要出“国兵漏”（被抓去当兵），送“出荷”粮（农民缴纳的各种杂税），农民还承担着各种苛捐杂税，不知什么名目的税赋使农民的一年劳动所得所剩无几。

敌伪的集家并屯，确实给抗联部队造成极大的困难，在虎饶地区活动的抗联七军经常在饥饿的状态下与敌人进行周旋。没有粮食，夏天吃蘑菇、野菜，冬天吃木耳、橡子、草根。为解决军粮问题，抗联战士曾在完达山密营中种了几十亩地，但由于战斗频繁，经常转移，接近成熟的庄稼也就被敌人毁掉了。

然而，被封锁的康德屯人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接济抗联战士。虽然送粮的次数比以前要少得多，而且每次送粮都要承担送命的危险，但人民

群众与抗联战士的血肉深情仍历历在目。有些屯长由于抗联部队及其外围组织的压力和工作，也默许老百姓为抗联部队送粮，对出去给抗联建密营的农民睁只眼闭只眼，而且经常出头应付敌伪的检查，说“什么事也没有”。归屯前，康德屯人给抗联送粮1 000多次，有时隔二三天就送一次，归屯后，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还送粮 100 多次，抗联给送粮的农民发支援抗联的证明，这些英雄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的档案里。

抚顺的“集团部落”



任何军队，一旦成为侵略军，就会变成恶魔的使者。在别国的领土上，由于战争处于强制的、不守法纪的状态，便集中犯下了集体屠杀、抢劫、施暴、强奸、放火等等所有一切伤天害理的罪行。他们站在胜利者的从容不迫和盛气凌人的地位，挥舞着残暴的刀枪。他们刀锋触及的绝不仅仅是别国的战斗人员，更有大量非战斗人员，无辜的百姓。战争最大的牺牲者是那些与战争并无直接关系的老百姓。他们没有抵抗的手段，在如烈火蔓延的侵略车轮下被随心所欲地蹂躏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东北大事变：富饶广阔的东北国土几个月之内陷入日寇之手，以盛产煤著称的抚顺也毫不例外，而抚顺煤矿早在日俄战争后就被日本侵略者长期霸占，抚顺人民被蹂躏的时间更长。

占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摆出统治民族的傲慢态度对待中国百姓，侮辱中国民众的意识越发疯狂。1932年10月10日，第10师团长广濑寿助对当时访问满洲的政友会议员筱原义政等人谈话，可以说暴露出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日本人无法无天的残暴行为，他说，来到满洲的日本人不论是绅士还是苦力，“一概侮辱中国人，因而从4月以来反日气氛高涨……。在街道上调戏漂亮的中国妇女，在车站不买票就进，人家干涉就大声斥责说‘瞎眼了?!你看我的脸，我是‘日本人’”，“有一次一位日本商人背着大包裹想要上车。这时与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国男人相遇，两个人在客车门口站了一会，挤得谁也上不去，这时那位日本商人突然打了对方一个耳光，对方就走到别处去了”，“在哈尔滨有一个信差送信，日本人过来说可能有自己的信，要放下邮袋看看，信差说那不行，日本人就大打出手，信差受了重伤”。

广濑的谈话只是反映了普通日本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行为，而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暴就更无

法形容了，日本人本身也不得不承认日军的残暴。后来当上侵华日军司令长官的冈村宁次在他的《阵中所感》中说：“一占据敌人的地方就沉浸在所谓占领地气氛之中，采取越轨的行动，丧失皇军威信的现象不少……胁迫县知事，大耍威风，随便指使其提供马匹及其他，或者好像对待自己的部下那样驱使满洲国军军官有的实在欺人太甚，缺乏对无辜人民的同情心”。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三宅光治在谈到“中国良民被杀伤”时说，日军“不经过任何调查审讯，只直感立即杀伤中国良民，或者胡乱侵入中国人房屋强要提供物品”。

这种情况下，东北人民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反日斗争风起云涌，各抗日武装此起彼伏，仅在满东、南满地区就有赵亚洲、金山好、老北风、唐聚伍、李春润、邓铁梅、长山好、大刀会等十余个抗日团体。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抗力量，日军进行了残酷的围剿，甚而把反满抗日军为对手的治安战转为以全体民众为敌的狂暴屠杀。1932 年 8 月 ~ 1935 年 6 月期间担任“满洲国政府”重要职务的品川主计战后回忆当时治安战的残酷情形说：“有时怀疑‘匪贼’逃入某部落，把那个部落的老少男女全部集合起来，用机枪扫射加以惨杀。

虽然参谋长坦率地承认事实，声明‘……今后确信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但是事实未必如同参谋长声明那样”。关东军自己也承认“在讨伐中有时被一时的感情所驱使，烧毁没有任何关系的部落（一百几十户）”，这种残暴行为随着集团部落政策的推行而进一步加剧。曾经充当“满洲国”“日系官吏”的盛长次郎 1934 年参加了日军的“扫匪”行动，他说“关东军似乎认为烧毁零星房屋搞集团部落是确保治安的要诀”，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的集团部落工作，更令人毛骨悚然，“由于三番五次地进行了讨伐，在延吉北方地区的根据地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留下一栋房屋，据说在这样的地方建立集团部落”。

在抚顺，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活动在新宾、清原以东一带，他率领的抗联第一军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一军三师在师长王仁斋率领下，与抚顺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在抚顺一带频繁活动。地下党支部担负革命宣传，发动和领导群众的工作，经常利用晚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抗日主张。同时尽一切可能收集敌伪情报，及时传给抗联第三师。1936 年 7 月，三师一部突袭抚顺东郊的搭连嘴子，逮捕了一批亲日分子和商人，收缴了一批物资。年底，三师又袭击了抚顺城北关，逮捕了一批警察、汉奸。抗联和地下

党组织的频繁活动，抚顺人民见了深受鼓舞，日伪却如临大敌。

日本在抚顺经营了几十年，掠夺了抚顺的大量资源，它是绝不会容许“犯上作乱”的，于是在实施残暴的屠杀——曾制造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同时，大搞“匪民分离”的集家并屯。敌人认为山谷中的居民和零星的自然屯恰是“土匪”（敌人对反满抗日志士的蔑称）孳生、联络、补给和生匿就食之所。如果将这些居民迁进大屯，烧光山谷间的房宅，则“土匪”就绝根断线，无处就食，亦难集聚，警报即自然减少。而且山谷居民归屯之后，宛如集拘笼中，不但便于管理统治，也便于奴役压榨，企图收一箭双雕之效。于是“集家并屯”的残暴手段开始实施了。

为便于统治，日伪变更了行政区域，废除区一级，扩大村级政权权限，实行县街村的管理体制。1935 年 11 月，日伪将抚顺全县改划为一街，30 个村。每一行政村辖 5～7 屯，每屯辖 3～5 部落，每一部落或辖 5～8 道沟或辖 3～5 自然村落。12 月中旬，各街村在日伪监视下开始选举街、村长。1936 年 1 月 5 日开始纠集各街村长在抚顺城中学校址受训 1 个月，3 月 1 日开始办公。

1936 年 7 月下旬，日军驻抚顺守备队队长

将集家并屯方案通知伪抚顺县参事官山下满男，限期8月1～15日完成边境地区集家并屯任务。被指定集家并屯的边境地方有120余个自然村落。在8月底必须并屯的有11个，余下的缓期到9月1日自动归并。

抚顺人又灾难临头了！虽然整个抚顺地区受着日本人的盘剥压榨，但毕竟每家每户还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虽然每日辛苦劳作尚不能添饱自己的肚子，但还算有自己几代经营的房宅，虽然破破烂烂，但算有栖身之地呀！然而当他们即将被逼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时，却依然蒙在鼓里，尚不知大火已到家门口了。8月1日，山下满男召集抚顺县长赵仲达和警务指导官立寅田太，告之集家事宜。然而伪县署既不张贴布告，更不作临时宣传，仅在行动的前一天用电话通知各有关村公所，村长通过电话，再分头召集有关屯长通知集家归屯的紧急措施，屯长回屯后再通知各部落长。腿脚勤快的村、屯长通知了本村屯的居民，而那些懒散拖沓的村、屯长根本就没有来得及通知，甚至有的毫不知情，更谈不上事先有任何准备了。遭殃的当然是普通百姓了，当他们得知被逼搬家的时候，自家的房子已经火光冲天了，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怎能不叫喊连天，哭声动地。

家住秋皮沟的崔庆廉夫妇，8月4日下午在秋皮沟东岗劈青苞米，他们突然看到山下烟尘滚滚，沟外开来两辆大卡车，一车内载着戴钢盔的日军守备队，一车内载着伪警察。崔庆廉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同妻子扛着一麻袋苞米棒回家。当他们来到街上时，全村已是乱成一片，家家被勒令倒出一半房子。他们喘息未定，只见汉奸李春和带着5名伪警察向沟东崔振林家走去。一个警察拿着一束火把，另两个警察在高喊准备烧房子。只有一个人在家的崔振林妻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个警察对她呵斥说：“马上要烧房子，屋内东西还要不要？要快往外边拿！”这时崔振林从沟里汗流浃背，气喘嘘嘘跑回来，哀求不要放火，但不起丝毫作用，无奈急催妻子将衣物和粮食从窗户向外抛出，可汉奸李春和不等东西扔完就把房檐点燃，红火黑烟霎时冲天而起。观望的崔庆廉再也不敢犹豫了，立即通知邻居张焕金家迅速抢救东西，又叫孩子跑去通知沟里的孟繁德家，自己同妻子急忙将屋内衣物、粮食等向外抢救。尚未搬运完毕，火焰已冲上檐头。沟东沟西，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崔振林的妻子坐在沟边放声大哭，张焕金的老母亲顿足捶胸呼天喊地。40多年血汗积累的房屋、家园，顷刻间划为灰烬。接着，沟里的孟家住宅的大火又烧起

来了，大东沟、小房身沟的烟火也上天了，整个山谷被火染红了，被哭声填满了。人们正在痛心疾首时，却又听得伪警察在喊："还不向下窝棚搬去，去晚了就没有住处了。"人们三步一回头，五步一顿脚，泪眼模糊，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家，陆陆续续向下窝棚集结，崔庆廉还算幸运占得了人家一铺小炕。整个下窝棚村已到处是人，原本只有 11 栋住房的小山村已变得拥挤不堪了，然而西沟、北沟、东沟三条道上仍有大量人群涌来，儿喊娘母寻儿，男嚎女哭，前后相连。有哭昏的，有气疯的，有想自尽的，一幅凄惨的流民图。

入夜时分，各处火光浓烟渐渐熄散了，日军警备队和伪警察也撤走了，这些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流民如同做了一场恶梦。然而这些却并非恶梦，确确实实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浩劫。人们在愁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呢？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啊！于是有的人回到故地去找那些残缸破罐；有的扛来未烧尽的木头；有的上山劈青苞米准备粮食；最惨的要算找个安身之所了，幸运的人挤进了并户村的房子，稍差一点的占了仓库，有的住上了碾棚，甚至有住马圈里的，然而仍有一半的人无处可住。晚饭的情景让人倍感凄凉，虽然街头巷尾到处青烟缭绕，然而却是泪眼相望，有咽

不下去的，有的干脆就不吃了，谁能料到，仅仅半日之间，午前尚能自给谷粟，而晚上却成为缺衣短食无家可归的难民。据事后调查，这次归屯行动，仅下窝棚一个部落被集家的37户，被烧的房屋120栋，近300间，至于各家被烧的粮食、农具、衣物、家具等就无法核计了。但至关生计的耕地的损失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归屯后，距离原耕地较远，因而大片耕地荒芜了，这37户就荒废耕地1 000多亩，损失粮食20几万公斤。而精神上的痛苦远比物质上的痛苦凄惨得多，当时流行这样几句民谣："天荒荒，地荒荒，日本兵来了更遭殃"；"天灾能躲，人灾难防"。

但是，灾难到此并没有结束，人们的意外负担就来了。第二天清晨，根据日军守备小队长的命令，部落长召集这些集家的农民们开会，商量住宅、秋收和修围墙的问题。根据日本人的意图，要求住宅尽量修建在下窝棚街向外扩展，木料随意砍伐，除木工、泥瓦工酌情补助外，其他建房费用都由农民自己解决。这样，从8月7日起，下窝棚部落的180个劳动力，7辆牛车，13辆马车共干360多天（包括秋收时间在内），建成了18栋简易住宅，每栋住2～4家，然而仍有38户连这样的房子都没有住上，或迁往远方亲戚家，或租修仓库，甚至迁到庙里、学校教室

里，勉强度过寒冬。

在人们赶筑自己住宅时，8 月 15 日敌伪便勒令开始修围子。牛车运黄土，马车或运石头，或运铁蒺藜。木工上山砍木桩、挂铁丝网，瓦工、木工砌炮楼，力工则在村外挖护庄壕。壕深 2 米，宽 3 米，壕上围铁丝网。围子的四角各砌炮楼一座，这么大的工程却只给 1 个月的限期，而农民们正忙于修造自己的住宅，又准备进行秋收，对这群亡家破产，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者，生活之惨就不言而喻了。农时错过了，即使忙里偷闲，全家老少均下地抢收，也只收到了往年一多半的粮食。家家的青苞米已早就吃光了，打下的粮食除了上缴地租，就所剩无几了，没等到中秋节，家里的粮食就已吃得精光。穿衣取暖就更苦了，集家的时候正是伏天，是家家户户拆洗棉衣、棉被的时候，一把大火把这些棉絮几乎都烧成了灰烬，人们只能穿着单衣过冬。新建的房子未到晾干就搬了进去，阴暗潮湿。采暖更是不易，冬天烧火上半夜是满屋潮气，下半夜是满屋白霜，人们在又饥又冷的冬季或患病或死亡，时有所闻，经常是东边刚出殡，西边又听到哭声。

全县集家归屯工作完成后，10 月末伪县长赵仲达、参事官山下满男、上田富夫、翻译张云桥、指导官立田寅太、翻译张心如等乘 3 辆轿车

和两台大卡车载着伪警察一个中队在武宪斌中队长率领下，大批人马开往营盘村来进行视察。他们先到达高丽营子屯地主朱成祓家，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就来到了难民的学校教室和大庙（莲花寺）的东西廊房，参事官、指导官等仅在教室外望望。赵县长和张云桥由朱成玉屯长引路从东庙门走进，赵县长刚跨过山坎，就听到墙下边有呻吟声。原来是涯子伙洛杨山嘴子住户杨俊卿因吃稻糠饽饽便秘，只好让他妻用棍子在肛门处往外抠，疼痛难忍，是以呻吟。县长不能再瞧下去了，走进廊房。廊房3间，住满难民，恶臭气流扑鼻而来。素日养尊处优的这位县长又不好急于出去，只得用手绢捂着鼻子，病人呻吟声，幼童啼哭声，小儿号寒声，妈妈哄慰孩儿声……响成一片。再看这一群面黄肌瘦、浮肿虚弱的流民，也许表示厌烦，也许内疚于心，赵县长蹙眉疾首，郁然而出。又向西廊望了一望，就同张翻译走出庙外，临去时让张云桥和朱屯长要了杨俊卿家吃的稻糠饽饽一个携回县署，他们离开学校后又乘车到下窝棚巡视一周，看看围子工程，然后返回抚顺县署。次日去得力营村，李家堡子。又次日去海浪村，松树嘴子。视察算是完毕。事后，赵县长说：“被集家归屯的部落最苦的是李家堡子。”试想：下窝棚惨状已如此，而更苦的

李家堡子又当如何呢？其悲惨遭遇就更不堪设想了。

视察之后，他们看到了这些无辜受害的难民确实无法活下去，若不施点小恩小惠，势必把这些人逼上梁山；或者成批死去后，奴役压榨的对象就没有了。乃由山下参事官和抚顺矿务局商讨结果，由炭矿拨5 000元，抚顺街商会援助了3 000元。买了高粱800袋（每袋75公斤），按每户1袋高粱5元现款施以救济。在救济粮款中扣出领粮、取款、开会、马料等开支，难民每户所得皆不足数，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集家罗难而致病死、气死、或疯或傻的，比比皆是。仅在实施救济前的一次调查中查明，被集家归屯而致死亡的人数竟占全部归屯人口的30%以上。

这次日本侵略者在抚顺县边境上共烧了下窝棚、瞎子伙洛、洼子伙洛、竖碑、三家子、李家堡子、坎木沟、五百牛碌堡子、台沟、碾子沟、松树嘴子等11部落附属的山谷居民住宅（其他山谷零星散户勒命拆除者不在其内）。

清原县地处辽宁东部山区，这里山沟纵横，林高树密，耕地稀少，家家只在居住的前后有一小块耕地，因此沟沟岔岔都有人居住，生活虽然比较艰难，倒也过得安宁。然而，日伪认为这一带山峦叠嶂，适于抗日游击活动，便把这一带山

区视为心腹之患，集家并屯也更残酷、坚决。

并屯之前，日伪通知这一带居民，限期3天，把房子全部扒掉、搬家，否则全部烧掉。3天的期限很快过去了，故土难离的人们没有几家扒掉自己多年居住的房屋。日本人的马队进山了，他们挨个山沟搜查，见房子就烧，见房子就扒。在七区湾甸子的大苏河村，原住村屯及沟沟岔岔的人家大约120户，500余口人，零散户不算，村屯有20几个。并屯前，日军伙同汉奸队、伪警察，每到一处，由日军小队长训话：皇军为了保护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消灭土匪，要求你们搬到一起居住。限期一过，大苏河区所有沟岔里的房子都点着了，日伪军警端着枪不许群众抢救自家的东西，粮食、衣服、被褥、箱柜全部化为灰烬。没有了房子的人有的逃到了北大荒，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投亲靠友，最后搬到大苏河村的仅20几户。并屯后的人们挤进了原住户的家里，有的户甚至住进了3家，炕上已经没有地方了，只好在地上铺上草。没有材料建房，就只好挖地窨子，盖马架子。

并屯后空下来的山区，被划为无人区，在无人区内发现有人就视为土匪或通匪，可以随意开枪打死。林家沟和西哈塘沟的两位农民在无人区里干活，被日本兵发现后立即开枪打死，有一位

姓郭的农民在山上找丢失的牲畜时也被日本兵打死，前后十几个农民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打死了。

归屯后的人们实指望过上当初日本人许诺的安定生活，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更为繁重的劳役。白天要修炮台，挖深沟，砌围墙，晚上还要巡逻放哨。巡逻时，如果遇上抗联战士是幸运的，只是如实报告部落内的情况。如果遇到土匪，就会受到拳打脚踢，百般刁难，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回去大病一场。巡逻回到部落后，还要受到日军和伪警察的左盘右问，说不出情况，就被认为是“通匪”，轻者被毒打一顿，重者当场打死。

在新宾县，是抗联活动极为频繁的地区，日伪讨伐队对这一带的扫荡也更为残酷，早在1934年，这里的山沟谷岔的散居住户就已被驱散，房屋被烧毁，人们只好挤到亲友熟人家。舍不得离开家园的，就只好在被烧落架子的房框子里，依靠残存的山墙，搭起窝棚居住。大四平乡缸窑村的赵淑珍，丈夫被日军杀害后，只身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方园几里的人家不是死了，就是逃了，只有这母子3人在这空旷的野地里受着煎熬。房子被烧了，只好在没有烧塌的房框上搭个柴草窝棚，夏秋季节还可住下去，而到了冬天就遭罪了，建不起新的暖的房子，就只好

拾来柴草压在窝棚上面，又用柴草围住窝棚的前后左右。来回出入，只能扒开柴草一个缝当门，没有被褥，只能铺着树叶，盖着树叶。取暖时，用三块石头围成一个炉子状，上面放上一块破碎的泥盆片，底下生火取暖，瓦盆片里再烧苞米粒用以充饥，或者直接把苞米棒放在火上烧着吃。冬天的雪夜野狼寻不到食物，便时常光顾她们的家，狼群围住这个可怜的窝棚窜来窜去，嘴插在雪里“嗷嗷”嗥叫，吓得娘仨紧紧搂在一起，一动不敢动，一直熬到天亮，这样的情景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所幸是“狼口余生”。

在苇子峪地区，6 000多间房屋被烧成灰，南山村有6个自然屯，800多户3 200多人，并屯后只剩下90多户，不到400人，其余那些人除了逃走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被冻死了，许多人家连一口人都没有留下，有的死尸由于没人掩埋，夜里被野兽撕碎吃掉，逃难的路上随处可见这些“无家可归”的尸首。而并屯的那些人，由于几家挤在一处，生活空间极度浓缩，加之饥寒交迫，一时间疫病横行，1937年春，新宾流行“窝子病”（即伤寒病），一人患病，全家难免，病重的不下20天就送命。南山村一姓杨家族19口人，不到1个月，除3人因出远门而幸免，其余全部死去。几个月之内，仅苇子峪、草盆、下

夹河、马架子、大四平几个部落，先后因闹“窝子病”死去1 200余人。死的人多了，棺材也不够用了，也没有人往外抬尸了，稍好的是破板柜、草帘子埋葬了亲人。活着的人企图用绳子捆住病人的灵魂，将水滴在蒙纸的碗上想召魂，然而并没有挡住病人的死去，更没有使死去的人复活，病倒的人更多了，死去的人也堆成山了。

敌伪实施的“集团部落”政策确实收到了效果。在部落内，老百姓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处处受到监视，而且饥寒交迫，疫病流行。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阻隔了。抗联一军面对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为有效防止敌军在秋天进行大规模“讨伐”，只好修建自己的密营，筹备给养，准备越冬。这些密营点多数建在高山密林之中，或是在山腰较为平坦地带修建的“地窨子”。大的密营可容纳 50～60 人，小型的可容纳 20～30 人。密营的生活异常艰苦，白天不能出密营活动，因为日伪军和密探轮番搜山，有时日本飞机还低空侦察，特别是冬天，一旦在雪地留下足迹，就有被围歼的危险，只有夜间才能出来活动。密营中不能生火做饭，因为防止目标的暴露，只能嚼些生苞米粒。密营的面积太小，容纳不了太多的人，抗联战士大多是抱着枪坐着睡觉。抚顺严寒的冬季长达 5 个月之久，

抗联战士的鞋、帽、棉衣严重不足，密营外是齐膝深的大雪，在零下30℃到40℃的冷天中，很多战士只能穿着单衣、夹鞋、光着头。许多指战员的衣服被树枝刮得破破烂烂，一条一条的，鞋子也掉了底，只好赤脚在山里行动。冬季里入睡，站岗的战士要时常触碰一下睡熟的同志，以防冻僵而死，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则昼夜不能入睡，时刻警惕敌人的偷袭。最要命的莫过于缺食少药了，冬天，战士们吃高粱米、苞米粒，春天吃草根树皮，实在没有吃的，有的战士只好吞食黄蜡充饥。山里没有食盐，许多战士因缺盐而患病，缺少医药，许多伤病员病情恶化而死。即使抗联战士处在这样艰难的境地，日寇还经常采取“拉大网”、“篦梳式”的方法围攻山林，到处放火，施放毒药。在红庙子、哈塘沟一带，日军采取了“彻底皆伐”森林的恶毒措施，疯狂破坏抗联密营。同时为从精神上瓦解抗联，日伪挖空心思地想出很多诱降招术，有时把女人画片、女人衣服撒在路上，有时把酒食挂在树上，什么“亲恳书”、“招降书”到处可见，想以此瓦解抗联战士的意志。然而，广大抗联战士的乐观态度使敌人的心机枉费了，抗联战士到处传唱这样的歌谣：“北风呼叫，大雪是鹅毛，冰冻三尺深，冻不了战士的心。”“天大的营房地大的炕，山高密

林支纱帐，茅草当成褥子被，抗联战士睡得香。”

集家并屯后的百姓在部落内受到了严密的监视，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人身完全失去了自由。然而，许多人仍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联战士。东小堡农民黄作舟因给抗联战士买过食品而惨遭警察杀害；南四平街姜宝库等人偷偷到南庙岭掩埋牺牲的抗联战士而惨遭毒刑；黄木厂的农民陈广学、张守廷、杨志清、纪永茂，草盆沟的刘凤德经常为抗联办事，后被发现，陈广学、张守廷被日军杀害；何家村农民杨秀峰、边沟门农民黄明生为抗联送情报而遭杀害；南四平村李绍堂、张凤林知道抗联的全指导员患病后，便买来了挂面、鲜鱼和胶皮鞋，以使他恢复健康；四方台张大银匠经常接待来往的抗联指战员，还主动为抗联捐献钱粮；窟窿榆树铁匠姜振川经常给抗联战士修理枪支，只有一支胳膊的张文廷常常偷偷地给抗联送煎饼……

残酷的集家并屯已使群众陷入了自身难保的绝境，然而一旦当他们知道抗联的指战员更苦时，仍倾其所有去帮助他们。

1935 年抗联在眼望山活动时，正值深秋时节，群众看到战士还没有棉衣，就暗地捐款买来布匹、棉花，为战士们缝制棉衣一天，眼望村刘殿文偷偷来到南山沟抗联密营给战士们送敌人准

备进山搜查的情报，当听说战士们因没有粮食几天没有吃饭时，急忙回到村里，立即组织群众秘密筹集粮食，仅夏家堡子一村就奉献了2 000公斤粮食。1936年中秋节前，三家子村群众捐款准备为抗联战士买油和面，王廷富受乡亲们委托带几辆车到县城购买，返回时，被郑家堡子警察署长堵住，王廷富被带到警察署受尽了严刑拷打，而他为了不牵连别人，一口咬定是自己送粮给抗日部队，第二天，王廷富惨遭杀害。

群众经常主动为抗联搜集、传递情报，掩护抗联的转移。抗联根据群众的情报，多次在三家子、关门山打击敌人。受伤的抗联战士也得到了群众的妥善照顾，千方百计弄来药材，使伤员陆续病愈归队。1936年10月，抗联三师在汤牛录沟一带与敌人发生战斗后，日军守备队跟踪追击，并命令各村出人到山上站岗，在高头岭一带，每30米就设一岗，监视抗联部队。日军规定，一经发现抗联，必须一个传一个传给“皇军”。关键时刻，眼望村的张连仲故意站在岗头上，让刘殿文到老虎沟送信，同时告诉前后岗哨不要向日军报告抗联的行踪，并催促抗联部队尽快转移。在群众的掩护下，抗联三师顺利脱险。一次，三师的几名侦察员来到清原北山根农民朱云龙家住了四五天，完成任务后准备归队，临走

时，朱云龙借来几副鱼网，把战士们化装成打鱼人，混过了敌人的岗哨。

日伪的“集团部落”政策，使人民群众遭受了重大灾难，也使抗联的斗争陷入了更为艰苦的境地。然而，人民群众与抗联的血肉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反而更激发了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仍然以各种方式支援抗联，共同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而奉献自己的一切，抚顺人民经过 40 年不懈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解放的一天。

哭泣的太平川

来到长春的人，都会参观一下当年的伪皇宫，亲眼目睹当年日伪当局的种种罪行。在伪皇宫陈列馆中，陈放着大量图表、照片、实物和档案，记录着当年侵略者的罪恶。当你来到一楼陈列品之中时，就会看到一块大沙盘，沙盘上摆放着围墙、壕沟、房屋、铁丝网等各种模型，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是当年的什么“新式”建筑物，其实这是当年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集团部落的示意图。久久凝视着这块沙盘，人们的眼前浮现出太平川这块沃土上曾经流过的血泪和漫起的浓

烟烈火。解说员的讲解，使人们记住了太平川这个名字，也仿佛感受了太平川人当年遭受的苦难。

1956年12月5日，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调查当年太平川的情况，调查员于德和经过被害人的控诉及实地勘查，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1936年，伪满洲国为了断绝我抗日军与人民的联系，在太平川划定东西宽有600公尺，南北长达660公尺的范围内建立集团部落，太平川及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除部分逃散他处外，约有270多户被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上述村庄被烧毁或扒掉民房4 490余间，并在该部落周围修筑了9尺高、6尺宽，长达2 532公尺的围墙，围墙外面挖有1.5公尺深、3公尺宽的水沟，水沟外面安设5尺多高的铁丝网，还筑有大、小炮台9个，分布于部落4门、围墙4角和部落中心，同时，部落内设有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各1处，以监视人民的行动。"

报告对当年的太平川集团部落的状况作了一个总概括，因篇幅所限，报告不能也不可能详尽描述当年太平川人所遭受的苦难，于是，当年受害者的血泪控诉为我们描绘了当时的惨状。

太平川，背倚小兴安岭，面临松花江，距西

边的汤原县城不到20公里。这里北有金满沟、大砬子、黑瞎子沟、黄皮子沟、白皮营、红皮营等山区，西有格节河，东傍黑金河。太平川东西纵横6公里，约有500余户。可以说，这里近山面水，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有人在这里活动，1931年党在这里设立了地下党区委，1934年前后，汤原中心县委也设在了太平川。“九一八事变”之后，这里的人民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以太平川为中心的10几个村屯，大约在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打狗队和农民自卫队等群众抗日组织，而且成为抗联第三军、第六军的根据地。这里的抗日斗争红红火火，日本侵略者对此如坐针毡。

于是，日伪统治者大搞“地方治安肃正”，“在治本的同时，加强治标”，向红地盘上的人民举起了屠刀。在太平川地区，敌伪加强了军警力量，以严密控制局势，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随时“讨伐”抗日队伍。同时遍设保甲和十家连坐，严密地封锁人民群众同抗日军队的联系。更为甚者，一场蓄谋已久的清乡围剿大圈屯，建立集团部落的行动开始了。

春节，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传统节日，是合家团圆、走亲访友，互致问候，燃鞭放炮的喜

庆时刻，一年来的愁苦烦恼都在这个喜庆时刻被冲得云消雾散，人们都在这喜庆团聚的时候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然而，1937 年的春节，对太平川地区的人来说，不仅没有分享到节日的快乐，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而且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样。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伪兵包围了太平川周围的村屯，军警宪特几乎是倾巢出动，一场大规模的圈屯行动开始了。

以太平川屯为中心，远至 17 里，近至 3 里范围内的黄有屯、姜家屯、齐家屯、温家沟、刘盛金屯、荣家屯、蔡家屯、庆余屯、郭家屯、杨凤礼屯、于家油房、滕家沟等 12 个村庄都被日伪军警包围了。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挨家挨户砸门、搜查、抓人，除了女人和孩子外，把全部男人抓到场院。日军按着汉奸和特务密告的名单，把人们分成两排，“好人”和“坏人”分别站立。对“好人”打骂一顿之后放走，对“坏人”则押送到太平川日军守备队，一共抓了 108 人先押在耿家大院。有一个汉奸地主叫耿子修，因为曾被抗联关押过 3 个月，认识一些抗日人员，于是趁机向日军效忠。日军把抓来的群众排成一行，顺次从窗前走过，耿子修在屋里从窗户往外看，密认“反满抗日分子”。这 108 人中被

他“认”出 68 人，这些人在耿家大院被关押折磨四五天以后，被押送到汤原县城日军守备队的小青楼里。

在小青楼里，人们经常听到这里传出的撕人心肺的惨叫声，这是日军对关押者的严刑拷打声。这些受刑者经历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压杠子、狼狗撕咬、刀劈火烧……在把这些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日伪军警便把他们用汽车拉到汤旺河，凿开已冻一米多厚的冰，把人丢进去。有两位老人被折磨死以后，竟然被丢在一家木铺的空棺材里，被抓到小青楼的 68 人，最后只有 6 人被放了出来，其余 62 人全被惨遭杀害，其中有太平川区委书记康正发和其他一些抗日志士，更多的是无辜的群众。

上述还只是公开的屠杀，更有许多秘密的屠杀，连被害者的尸体都无影无踪。太平川一位叫刘仁禄的人被日军抓走，他的家属委托邻居梁万福、贾老疙瘩两人去守备队担保。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梁贾二人扛着木柈，走到太平川南门外，被日军头目用战刀劈死，然后堆上梁、贾二人自己扛的木柈，浇上汽油，焚烧灭迹。还有的人被日军杀害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扔到井里，有的则是直接扔到井里活活淹死，而被害者的家属却不知道尸体在何处。后来在黄家井里发现 3 具尸

体，在安洪富井发现8具尸体，在董家井发现6具不知姓名的尸体，而前孔家井里则一次发现20多具尸体。最让人震惊的是董家井，它坐落在一堵堡子墙下，并没有人知道井里曾埋过人。后来人们看到墙根井旁总有野鸡逗留，并且常常飞下井里啄食，于是下去探查，才发现井里有6具尸体，而且尸体被石块紧紧地压着。

在进行一连串的屠杀，恫吓之后，日伪便开始了并屯——建"集团部落"。日伪规定，所有居民必须在限定的期间归并到指定的地点，定点周围的村屯，必须毁掉原有的房舍。善良的人们以为这不过是日伪军的恐吓而已，然而他们真的太天真了。规定的期限刚到，日伪军的刺刀、火把进村了。太平川屯两部300余户，约1 800间的民房被扒掉，粮草家具等财物被全部烧毁。东部的民房也被扒掉，仅留中部10余户，作为集团部落的聚集点，并把太平川屯周围12个村的部分居民约140多户，强迫迁入太平川集团部落，这些村的民房、粮草、家具和其他财物大部分被烧光了，4 000余垧耕地荒芜了。除并入太平川屯的几百户外，其他群众则四散逃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而那些拖延搬迁和反抗的群众，则遭到了严酷的捕杀。刘盛金屯的群众不愿向太平川并屯，日军开进屯内，烧了全屯的房

子，把全屯的男女老少集合，无一例外地跪在一个场院里，挨个用棍棒抽打，被打的人个个头破血流，惨叫声撕心裂肺。正在产褥期的刘其昌的妻子被赶出场院，也让跪在地上遭毒打，没人可怜她是一个刚生完小孩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哀求，而日本兵却毫不为所动。日本兵走后她卧床不起，不久就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而正吃奶的儿子也活活饿死了。刘奎昌由于拖延往太平川并户，日军于是向他的屋子里打了一排机枪子弹，他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惊吓，不久也离开了人世。蔡家屯的居民蔡清海因为拒绝搬家，家里的房子被烧掉了，他的父亲抱着孩子逃难，在雪地里把10个脚趾全部冻掉了，病了3个星期就死去了。蔡清海也被日军用刺刀逼问为什么不搬家而吓得患了浑身发抖病。刘肖氏一家老小7口人也因房子被烧，在萝卜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不得已搬进了太平川。

在经过日伪军一系列的烧杀威逼之后，太平川周围的人们含泪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除少部分逃离外，大部分来到了这个戒备森严的围墙之内。

过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人们，在围墙里却遭受了牢笼般的待遇。在几百户的太平川部落，却驻扎着100余人的日军守备队，建有20多人的

警察署、20多人的自卫团，此外还有协和会、道德会，并建立了可关押60多人的拘留所。更让人胆颤心惊的是，日伪当局从佳木斯派来丁保祥、黄世义等5个汉奸特务，在太平川以开饭馆为掩护，进行特务侦察活动。在太平川部落内，实行的是保甲制和十家连坐，一家所谓犯罪，十家同样论处。规定三五个人不得结群走路和谈话，夜间不准插门、点灯、说话，为此，警察和特务经常潜到居民的房前屋后进行暗查偷听，如有人"犯归"被偷听的警察特务发现，遂即闯进屋里严加盘问，并用军刀背毒打一顿。警察、特务两天一查户口，三天一查夜，查所谓黑人和胡匪。如果外出、来客必须到警察署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外出或留宿客人，否则就以通匪或思想不良的罪名加以毒打和拘禁。规定早晚不得出入部落，太阳升起时群集外出劳动，太阳偏西日本旗落必须归宿。不分男女，12岁以上必须随身携带证明书，出入严格检查。如一位叫李仁的居民同其他4人去汤厚县城办事，回来时因城门已关，只好蹲在野地里，不敢叫门，冻得受不住便冒险爬墙，结果被警察抓住，于是被关押在炮台中过了一夜，被打得死去活来。

太平川的人们不仅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一言一行都要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和监视，而且经常有

人被无缘无故地抓去毒打、拘禁。有的人因熬不住严刑拷打自缢于狱中，有的则被扔进河中、井中。日军守备队经常侵入百姓居室，竭尽残暴，强奸妇女。张禄的妻子被日军强奸后含辱死去，汪某的妻子被7名日军轮奸后夫妻二人被迫流亡外地，不知所踪。

日军对太平川居民一方面实行残酷的暴力压迫，同时还进行思想麻痹，实施奴化宣传教育。通过日满协和会、道德会等组织，大力宣传所谓"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皇道精神"、"日满不可分离"等思想，妄图麻痹毒害人们。

太平川的居民不仅失去了家园，而且还遭受了残酷的奴役。15~20岁的青年被胁迫组织了青少年团、协和义勇队，强行军事训练。对青壮年妇女进行防空演习，白天强迫妇女站岗，晚间由男子接班。而徭役则更为严重，修水壕、围墙、警备路等所谓"官工"劳役是家常便饭。每户一年要被强征30余次，人工官车次数则无法计算。每当日军搜山"讨伐"时，即强征青壮年为其背给养，但却给予种种虐待。伪康德6年8月，在太平川一次就强征20多人，长途翻山越岭达一个多月，每天背负120余斤，却只给5两重的面饼吃，而且不给水喝，人们口渴时，要避

开日本人的眼目，偷喝水沟里的脏水，有时连续四五天连一顿都吃不饱的5两饼也不给了，日军就命令人们吃草喝脏水。晚间睡在山地上，肩背磨成大片水泡，还得忍痛挨饿不能吭声，否则即遭毒打。大部分人因此患上了腰痛、腿痛等疾病，有的还成了残废，一个姓董的老头还死在了半路上。出劳工每年有二期，25～55岁的男人一律强迫当劳工，每期3～6个月，有的人一年被迫去二次。不去就抓，患病者也不例外。太平川先后有五六百人被胁迫到鹤岗煤矿和佳木斯日本兵营强制劳役，而吃的是橡子面，喝的是沟里的脏水，而且还不供饱。人们因饥饿无力劳动，卧病不起时却遭到毒打，因出劳工而致病、致残、致死的有几十人。

太平川人还要忍受任意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人、畜、土地和房屋都得纳税，像什么土地大租金、人头税、保甲费、协和会费、牲畜税、车牌子税、储金、门户费、天照大神费、狗牌子税、飞机现纳金、道德会费等10余种，全部落农民每年要付出约300吨粮食的杂税负担，打下的粮食除去各种税费，几乎所剩无几，人们只能在饥饿的状态中度过这不知何日才能到头的苦日子。当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个太平川啊！

在长春伪皇宫陈列馆，还存有一份《1936

年伪满洲国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二区太平川地区实施集家并屯所造成的损失统计表》（见附表），列出了集家并户的村屯、户数、房屋和并入流出情况，统计有全部烧毁和扒掉的房屋数字。这份统计表上当然无法列出刺刀的威逼，没法描述日军的两次大圈屯、归屯并户以及敌人对抗日人民群众的杀害。然而，透过这些数字却有力地显示了日军的残暴，人民的苦难，这火与血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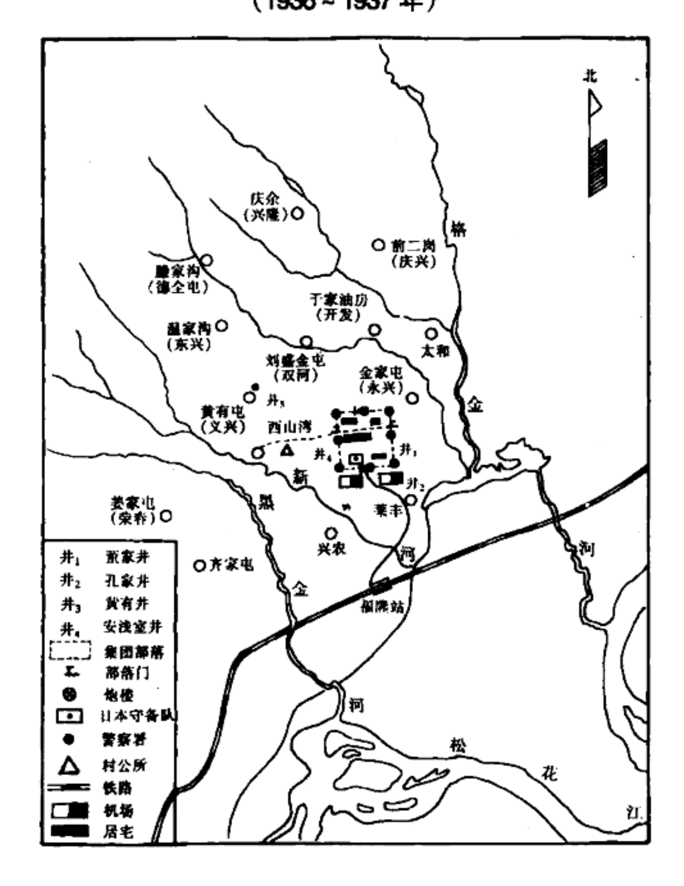
附表：

1936年(康德3年)伪满洲国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二区太平川地区实施集家并屯造成的损失统计表

距太平川里程(华里)	村名	户数	房屋		并屯状况		破毁房屋		备考
			座	间	并人太平川户数	流出他处户数	座数	间数	
	太平川	500	1 000	3 000	130	370	1 000	3 000	全部烧毁或扒掉
3	刘盛金屯	15	20	70	10	5	20	70	同上
6	于家油坊	50	60	200	30	20	60	200	同上
12	杨风礼屯	8	8	20	6	2	8	20	同上
17	庆余屯	10	90	100	10		30	100	同上
12	滕家沟	30	40	90	10	20	40	90	同上
8	温家屯	20	40	60	20		40	60	同上
5	黄有屯	80	140	400	50	30	140	400	同上
15	姜家屯	90	140	270	2	88	140	270	同上
12	齐家屯	30	90	180	1	29	90	180	同上
8	蔡家屯 荣家屯 郭家屯	20	40	100	10	10	40	100	同上
合计	13	853	1 608	4 490	279	574	1 608	4 490	同上

太平川集团部落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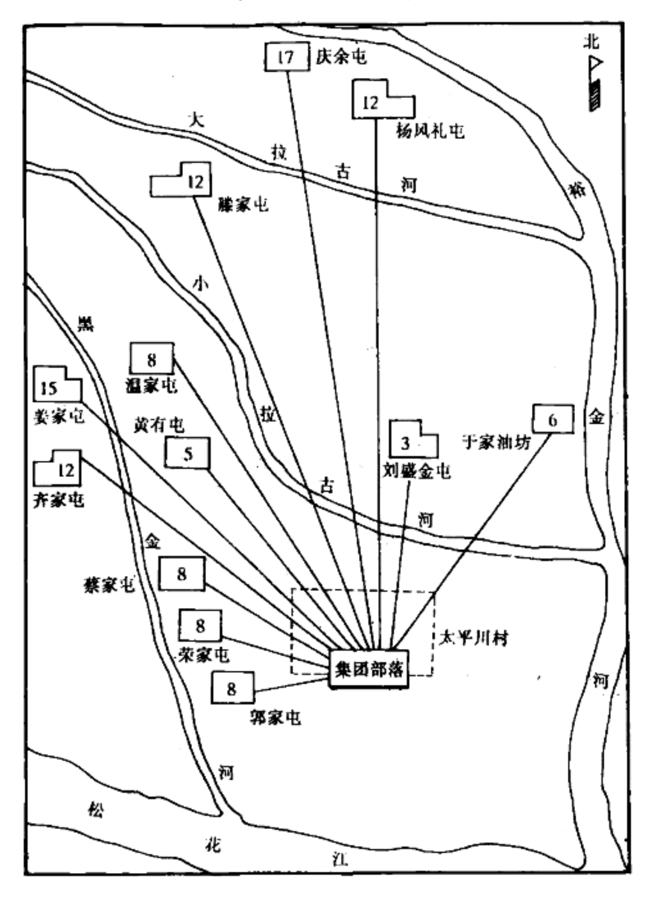
（1936～1937年）



黑龙江省汤原县史志办公室供稿

太平川集团部落示意图

（1936～1937 年）



注：数字第距为太平川里距

笼子中的宝清县



1938 年春，冰冻了半年的东北大地刚刚开化，树枝已能见绿了，正常年景，“猫”了一冬的人开始下地忙碌了，平地的在挥舞着锹头镐把，运肥的在扬鞭催马。大人小孩都牢记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都希望打好春天这个底，秋后能有个好收成。

奇怪的是，在宝清县（今黑龙江省）境内，往年忙碌的景象今年见不着了，空旷的大地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丝马鸣羊叫，山里、林子里也是静悄悄一片，过路的人都在纳闷，这里究竟怎么了？

然而，在方盛、望山坡两个地方，却是人头攒动，尘土飞扬。干活的人全是青年、壮年，而且监工的不是端着枪就是拿着刀。原来这里在修建“集团部落”。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宝清县人民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斗争。从1935年开始，宝清地区的抗日活动日趋活跃，各路抗日联军经常在宝清县南、西、北三面山区出没，屡挫日伪军警的“围剿”和“讨伐”。于是，日伪当局把早年推行的“集团部落”政策在这里铺开了。先是在方盛、望山坡两地，日伪按各区各甲驱赶青壮年齐集于此，修建“示范部落”，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人们实指望修建完这两个“示范部落”就可以回家种地了，然而这种打算落空了。大规模修建“集团部落”在全县铺开了，而这正是种大田的时期。伪军警和自卫团强迫12岁以上男子，不论老少，都赶到了工地上去。所有耕畜、不论牛马驴骡，都套上了各种车辆、爬犁，拉土的拉土，运草垡子的运草垡子。有的还要套上开荒洋犁，到附近甸子拉带草皮的土垡块，充做砌大墙的主要材料。屯长、牌长每日分配指挥群众砌墙、挖沟、运料，日本人、警察、自卫团作监工。农民早上要从家里带饭，中午只给1小时的

休息、吃饭时间，其他的时间只能干活不能休息。而且干活时必须一个撵一个，运垡子、递垡子、砌墙、上土环环紧扣，稍有怠慢，便被说成“磨洋工”，遭到鞭打脚踢或集体罚跪。日伪军警捉弄人时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在修七星泡“集团部落”时，一个叫长赖的日本人，如果谁出工晚了或者干活慢了被他撞见，就要罚谁骑在3米多高的单木大门梁上。如果运草垡子的走路不带小跑，就用军刀背猛砍。

部落的位置一般设在比较开阔的平原地区，尽量避开山区、林区。因为山林地区易于抗日部队的活动而不利于日伪的“讨伐”。于是日伪一方面对山区加强封锁，一方面强行把山区的百姓迁到指定的平原地区。日伪军警、讨伐队频繁对山区进行搜索、扫荡。如果“扫荡”吃了败仗，那么百姓就遭了殃，遇见可疑人便抓，不是被说成是土匪，就是“红派”（指抗联）。而被抓走的，轻者被送往县监狱，重者就被砍头了。一次，伪兴安军在庙岭沟吃了败仗，便抓了两名中年人，硬说他们是“红派”，把他们绑在双柳河村子口，从正在修部落的民工中要了4个人，在村东南的树林中挖了一个大坑，随后将两人推到坑边，用马刀残忍砍下两个人的头，却命令4个民工把尸体埋上。从未见过这种杀人场面的民

工，被吓得魂飞魄散，在夜里不知被恶梦惊醒多少回，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还心有余悸，脑海里不时浮现那杀人的景象。

对山林地区加强封锁之后，日伪一面逼百姓修部落、一面强令搬迁。特别离部落较远的靠山区居住的首先要搬到部落里，如果到期不搬，讨伐队、兴安军便赶到了，一把火把房子烧掉。搬到部落的农民来不及盖房子，只好搭个草棚子或挖个地窨子勉强住上。西部地区的大小梨树沟一带居民均迁到靠山、望山坡；黑瞎子沟、庙岭沟一带居民均迁到双柳河子；太平路一带迁到凉水泉子；锅盔山附近的一带迁到王福岗、杨荣围子等处。每个部落都仿照方盛、望山坡的模式修建，到 1939 年，整个宝清县共建了 45 个部落。每个部落，根据片内户数多少，确定占地面积和部落的大小。百户以上的部落均占地 150 亩；40～60 户左右的占地 120～150 亩。部落大部建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用草垡子垒墙。墙高 3 米，上下宽半米，每隔 3～4 米设一垛口。墙的四角设 4 米见方的炮楼，炮楼外侧三面设有炮眼。墙外挖护城壕，壕宽 2 米，深 1 米。还有宽半米的环墙巡逻道。大的部落设两大门，小的设 1 门，门的方向视交通情况而定，一般都向交通要道。部落内按户数多少划分 2～4 条街，4 个居民区，

每区 10～20 户不等。这样，宝清县的行政区划就由原来的区甲制改为村屯制。每村管辖若干屯，村设村长 1 人，司计、助理、跑牌（指通讯员之类）各 1 人，费用由各屯摊派。屯设屯长 1 人，文书、跑牌各 1 人。每屯又按住户情况，按街道或居民点设牌，每牌辖 10～20 户，设牌长 1 人。屯内的公务费用，由各户摊派。

当人们被迫从世代居住的家园来到部落里，等待他们的是牢笼一般的生活。当年日伪除了用强制的法西斯手段血腥镇压外，还利用宣传画、编歌谣等诱骗群众，宣传集团部落如何的好，是他们安居乐业的好去处。这里笔者摘录了一段当时的歌谣："秋日凄凉菊花新，我劝抗日军，你们快回心，满洲大国扎下根，各处日本军、讨伐队，进山林，见着房屋用火焚，你们无处去安身，何不投降改为民。"当人们来到这个"安居乐业"的部落时，发现他们原来的自由自在顷刻间无影无踪了。

部落里可谓森严壁垒，戒备异常。日伪当局为了强化社会治安，对警察设施大大加强。县设警务科，街、村设警察署，街内设 2～4 个派出所。个别敌伪认为"麻烦"的屯，增设警察分驻所，每个屯还设自卫团。区区上百户的村屯竟有警察几十人。

在屯内实行的是“10家连坐”制，一旦1家发生“问题”，那9家就得受株连。从1938年开始，城乡居民一律实行“居民身份证明书”制，简称“证明书”，老百姓称之为“证命书”，认为没有它，也就没有命了。凡年满12岁的，不分男女，均经警察署签发贴有1寸免冠照片的证明书。硬白纸片证外套硬玻璃纸皮，防雨防潮，便于随身携带。每当出入部落大门时，必须出示证明书，经岗哨检查后，方准通行。

部落规定，农民出入部落的时间为早晨是在日出后开大门，农民可以出村下田，晚间在日落之前必须归屯，日落即是关门的时间（没有大门的，则用两架移动式铁丝网封锁出入口）。农民如果回来晚了，只好在大门外过夜，夏天遭蚊虫叮咬，冬天则在雪地里受冻。如果警察、自卫团高兴了，让你在外等三五个人再开大门，但往往遭到打骂、训斥，甚至拘押在炮楼里受刑。

谁家来了客人，客人要持该人证明书去屯公所“挂条”，登记什么关系，来干什么，住几天，何时离去等事项。如不“挂条”，一经查出就要遭来训斥、处罚，甚至坐牢。屯内的人如果外出办事、串亲戚也要事先到屯公所登记，经批准后方能出去。延期回归者，除有去地证明外，都要受到审讯或给予一定处罚。警察署和自卫团部都

设有带木栅栏单间小牢房，一般叫“禁闭室”，每天都会听到那里传出的惨叫声，那是“犯规”的百姓正遭受着严刑拷打。

每个部落都有自卫团把门、站岗放哨，警察们进行监督。每晚由屯公所派屯民若干，轮流值班。值班的人放游动哨，手拿木梆，沿围墙内侧的巡逻道，走两步敲一下，每逢墙垛口处，必须向外张望，如发现可疑现象要立即向值班自卫团或警察报告。如果警察或值班自卫团听不到梆子声，便认为游动哨偷懒或睡觉，找到便是一顿拳打脚踢，甚至蹲“禁闭”。

白天，部落里的男人下地干活，警察们便趁此机会挨家游串，调戏年轻妇女，夜间常以查夜为名，去刁难男子。一次，有3个兴安军，“扫荡”回来后，抢了不少鸡、白面、粉条，便来到双柳河屯的蔡家，让其年轻的妻子给他们炖鸡烙饼，他们饮酒作乐，喝到疯狂时轮奸了这个女人，女人被糟蹋得一个多月不能下地，然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

受尽欺压是部落百姓的家常便饭，然而却代替不他们腹内真正的饭菜。大忙时节，百姓们被逼去修围墙，于是撂地、荒地比比皆是，特别是靠边远山区的土地几乎全撂荒了。第二年归屯便闹起了饥荒，农民只好用野菜充饥。有的家吃灰

菜中毒，混身发青，脸、腿肿得又大又粗，但也只好硬挺着，因为没钱请医抓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活命，只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然而一年的收成除去缴纳地租仍然所剩无几，还是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因为部落内的十几种苛捐杂税把他们一年辛苦劳累的所得全榨干了。部落内的捐税种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农民交的税有"警学大租"、"门牌税"、"户口捐"、"牛马税"、"狗牌税"、"车牌税"等十几种，此外还要分担村屯公事款及各种摊派、县、村官吏、警察下屯的吃喝招待也要由百姓均摊费用。付家屯的石丕诚一家6口人，其中5口人能干活，然而仍然吃穿不上，父亲穿一条带花纹的"更生布"裤子，羞得出门不敢抬头。更有甚者，都兴才两口子合穿一条破单裤，早起老婆做饭穿，丈夫下地干活穿。家里的炕上没有被子，只能钻进麦滑秸里遮身取暖。

居住条件的恶劣，食不裹腹的生活，人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疫病的流行，人们每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归屯后的第二年，一种"窝子病"，"传染病"流遍了宝清县。得病的几乎都是全家，老的好了，小的病倒，常年不断，重者命丧黄泉。1938年冬~1939年春，小儿麻疹病流行，高家屯和付家屯1~8岁的小孩全部死光。

人们无钱请医治病只能搞一些土办法，吃点偏方，重症者只有等死，有点零钱的人去县城抓药，还害怕路上遭抢劫。付家屯的石丕诚去宝清街抓药，遇见兴安军骑兵，吓得赶紧躲到路边的沟里，然而一个骑兵抽出马刀骑马直奔他而来，马刀从他的头上掠过，他被吓得嚎啕大哭，而这群骑兵却哄笑着扬长而去。

宝清的部落百姓就是这么挨着不知何日到头的苦日子，他们在企盼，安居乐业的时光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附：宝清县“集团部落”名单

1. 宝清街公所，下辖四个城区，即安仁区、居义区、乐善区、业城区，简称安居乐业；六个城关村，即南元村、南亨村、南利村、南贞村，简称元亨利贞，东关村、北关村，简称二关。

2. 大孤山村公所，下辖 7 个屯，即十八里屯、十二里屯、付家屯、高家屯、望山坡屯、双柳河子屯、北八甲屯。

3. 凉水泉子村公所，下辖 3 个屯，即凉水泉子屯、巨宝山屯、二道山子屯。

4. 七星泡村公所，下辖 10 个屯，即七星泡、窦家油坊、李朱屯、平安堡、刘家炉、程家围子、曲家屯、兴隆岗、杨荣围子、王福岗屯。

5. 七星河村公所，下辖 3 屯，即七星河、

常张屯、杨树林。

6. 青山村公所，下辖9个屯，即一甲、二甲、三甲、四甲、东五、西五、东六、西六、本德屯。

7. 夹信子村公所，下辖6个屯，即夹信子屯，徐马架子屯、靠山屯、头道河子屯、方盛屯、万金山屯。

8. 大和镇村公所，下辖大和镇。

被蚕食的长城



时间：1942年8月上旬。
地点：北京。

日本侵华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召开兵团长会议，一场更大规模的“扫荡”计划划定“大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制造纵深千里的“无人区”封锁线出笼了。

冈村宁次亲自做了布置后，日军出动重兵对冀东进行了疯狂“扫荡”，几十万民工被强征沿密云、平谷、蓟县、遵化、迁安等山区边缘挖成封锁沟，将长城线上直至封锁沟以内的村庄全部烧光，将群众

全部赶走。根据敌人的统计数字，仅迁安、遵化两县长城线上的山区就有 1.57 万多间房屋被烧毁，64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毁为焦土，10 万居民被赶出了家园，这里成为日军称作的“无住禁作地带”，也成为中日双方最敏感的战略争夺地带。

然而，早在 1940 年冬和 1941 年春，日军便在长城内外搞起了集家并村——建集团部落，只不过当时的规模还小，大规模建集团部落则在 1941 年秋后，长城线上的村庄开始大批地被烧毁了。而到 1943 年达到了高潮，“无人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直到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而终止。

长城线上的“无人区”地域之广让人震惊。据《热河抗日简史》叙述：“至 1944 年，热东、热南及辽西峰峦千里的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激烈斗争。敌寇所制造之‘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西长 700 里（从绥中至滦平），南北宽 250 里（从长城到锦承路北），面积175 000平方里，包括 8 县地区。伪热河省 400 万人口，有 105 万人被敌驱入人圈。”然而，据现在掌握的资料，这个范围恐怕比上述还要大许多。

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建“人圈”的过程中，对山区根据地推行了彻底的“三光”政

策。

杀光：以血腥的屠杀驱赶群众进入集团部落。对不愿进入部落的人见一个杀一个。长城线上顷刻间血肉横飞，如同当年的南京大屠杀一样。日军也搞起了杀人竞赛。丧失人性的敌人进入山区根据地，像追捕猎物一样追逐中国百姓，将人杀死后残忍地割下耳朵用铁丝串起来，按数邀功领赏。而屠杀疯狂的时候，就连牲畜、家禽也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不放过，在热南山区根据地里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都见不到了。兴隆县羊羔峪村一户人家养着一头小猪，人们都把它当成稀罕物。这头小猪对当时的战争环境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山头一喊哨报警，它就从圈里窜出，乖乖地跟在人们的后头躲避灾难。

烧光：几千个村庄，几百万间房屋被烧毁，而且这些房屋大部分被重复烧过多次，有的被烧十多次以上。兴隆县的驴儿叫村先后被烧 18 次之多。山林是我军民赖以隐蔽的地方，日军每年春季扫荡时，就到处放火烧毁森林。连续几年，长城线上遍山浓烟滚滚，烈焰冲天，整个无人区变成一片焦土。

抢光：从开始集家并村起，伴随着杀光、烧光的就是彻底抢光。敌人的掠夺疯狂到了极点，穷苦山民赖以生存的一点点粮食、衣物被抢劫一

空。然而仍不罢手，每次扫荡依旧到处抢掠搜索，就连半口破锅，一个空瓶也不放过，或者抢走，或者砸毁。逼得群众没有办法，只好把瓶罐、锹锄挖洞埋起来，粮食和衣物则随身携带。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热河省被抢走粮食 96 亿斤，牲畜248 000头。

而敌人最阴损最灭绝人性的一招就是“割光”。每当春夏之交，青苗正在茁壮成长之际，敌人就要举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开始由于敌人“经验”不足，割得早，群众又种晚茬，敌人又来割第二遍，当群众再种些蔓菁、萝卜时，还是来给割掉。其目的就是摧毁我军民一切生存条件。

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使长城一带的人民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有家不能归，有房不能住，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脚快的逃走了，老弱病残恋恋不舍家园的，大都被杀戮，就连几千年的文物古迹也不能幸免，在“三光”中化为了灰烬。而接近无人区地方的老百姓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曾有人到热河最西北部的一个接近无人区的地方——樊梨花庙，见到这样一幅惨景：在田间锄地拔草的人，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全不穿衣裤，多数腰中围一块破布或麻袋，好像没有一点羞耻感似的，如同到了未开化的原始部

落。然而一问当地人，她们为什么袒胸露背呢，是天气热吗还是没有衣服可穿呢？当地人极为紧张四下张望一会，小声说，这是当地的规矩。原来，日军扫荡时，发现耕地的人身藏武器、干粮带，有通八路嫌疑，于是下了禁令：男人不许到这里种地，女人种地不许穿衣服，后经要求才被允许在腰间围一块布。不但这样，有时日军来了，还扯掉仅能遮羞的一点破布，任意调戏、耍笑。年轻的女子有的疯了，有的跑了，所以在田间劳动的只有这些老弱不堪的女子了。

日军制造无人区，不但未能挡住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攻入热河省内部。无人区的青壮年除死者外，纷纷加入八路军的队伍。他们熟悉地理环境，了解人情，还能探听到敌人的底细，敌人被迫疲于奔命，于是敌人想出了集家政策。

残忍的集家政策规定：

1．为实行王道主义，“保护”人民利益，便于皇军“剿匪”工作，进行全省集家。

2．凡不满10户或稍多一点的“通匪”地区居民，一律迁移指定部落或地点，不准有任何留恋。

3．一经被指定迁移的人民，不拘远近，一律限期搬净，过期即是有意资匪，尽行烧除。

4．不向指定地点迁移，逃亡山里者，均为

不法，枪毙不贷。

5．所遗田园，须按驻在警防机关指定时期耕种，遇有违犯，严加法办。

6．所有指定的集团部落周围，都得修1丈2尺以上的高墙，开2门或3门，最多不超过4门，每门修炮台1座，守卫室3间，昼夜设置岗哨，遇有外来客人，均须验证登记，否则不准入内。

7．为锻炼国民道德，尊皇“爱国”思想，凡出入卡门时，须向日满国旗和门卫人员敬礼，必要时得令背国民训。夜间禁止出入，遇有特殊事故，必经保甲长证明事实，门卫批准方可放行。

8．门卫有检查盘问搜身权限，无论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绝。

……诸如以上的20余条规定，长城线上的百姓过上了比监狱还要凄惨的生活。

群众被驱赶进入“集团部落”，碰到的头一个大困难就是生活没有着落。以兴隆县为例，原有2 000多个自然村，被指定的集团部落199个，约10个自然村并成一个部落村。十几个自然村相距几十里的山路，家乡又被划定“无住禁作地带”，根本不许有人迹存在。住房被烧得片瓦无存，衣物被抢劫一空。可是被赶进“人圈”时，

还是要被彻底搜查，随身携带的一点点破烂衣裳和粮食，又被搜掠一空。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进了“人圈”后，只能向当地的地主租种一点土地。而部落周围被划定允许耕种的土地又少得可怜，即使肯出高额租金想租得赖以餬口的土地也是极难的事情。“人圈”里的居民很快出现了“四多”——讨饭的多，病死的多，吃糠咽菜的多，披麻片、光肩膀、露乳房的多。

“人圈”四周是1.5丈左右的高墙，墙顶上是铁丝网或插满枣树刺枝。墙上有垛口，里侧有“马道”，距几十米设一个站台，围墙四角各有一座炮楼。每个部落配有10～50名警察，他们把居民编成“自卫团”或叫“灭共义勇队”。发给每个18～35岁的男子大枪1支，子弹50发。发给每个35～50岁的男子火枪1支，火药2斤。发给每个青壮年妇女扎枪1支。在警察监督下，让居民们站岗放哨，配合夜间巡逻。夜里经常鸣锣吹号，群众闻得信号，必须立即跑上围墙去跟着呐喊呼叫，彻夜不绝。白天总是太阳升得老高，看看确实“平安无事”，才开门放人去耕作，傍晚太阳未下山就关门戒严了，回来晚的就只有在野地里过夜了，遇有风吹草动，可能就是几天不开门。可在部落内，一般人家是必须“门户开

放”的，勒令“夜不闭户”，不许关门，不许点灯，不许说话，以方便“检查”。群众居住的所谓房子，多半是搭的马架子窝棚，几个寒暑，始终住着原来的窝棚。冬天，塞上暴风雪袭来，屋里屋外一片雪白冰冷彻骨，兴隆县在二三年中就冻死1 000多人。到了夏天，屋里外头遍地泥泞，污水粪便，臭气熏天。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广泛流行，还有更可怕的败血病，得了病的人鼻口喷血，死亡率极高。仅 1943 年夏季一次瘟疫流行，兴隆县就死了6 000多人。靳杖子村一天就死了 40 多人。一次鼠疫流行，更是尸横遍野，仅大水泉村就死了 300 人左右。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死了人没人往外抬，尸体只能臭在家里。

居住的环境如此，那么吃穿的情况如何呢？在部落内，居民的生活用品美其名曰“配给”。每年每户洋布 7.5 尺，每人一年白面 1.8 斤，豆油 4 两，每人每月盐 7.5 两，每户每月火柴 1 盒，此外还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碱、糖、大米等。而这些配给品，经过县、村、甲、排层层克扣，到群众手中就所剩无几了，农民没有火柴用，只好用火石打火和保存火种，没有灯油，就用松柴照明，人的眼睛、鼻子经常是漆黑一片，配给到

群众手里的布料，都是质量极为低劣的人造纤维，下了水一揉搓就破烂，群众称之为“唾沫缎”就是这样的布料经过层层克扣到群众手里也只有三四尺了。于是人们经常看到，在地里耕作的许多人只是身前挂着一条破布或麻袋片；有的成年人一年四季只有一身破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下田时脱在地头上，光身子干活。许多居民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一次，几名八路军战士化装进入部落，到一家找水喝，屋里女人惊慌喊叫不要进来。原来屋里两个青年姑嫂，一个光着身子，一个仅穿着漏洞的裤子，出不得门。战士们含泪脱下自己贴身的衣服扔进屋去，他们才腼腆出来招呼战士。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无人区”活动过的人都见过。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好山河敌侵占，烧杀抢掠修人圈，死走逃亡家破产，十七八的姑娘没裤穿。”

群众日常所吃的粮食叫“共合面”是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混合磨制成的。群众私藏一点粮食被搜出，就要当成“经济犯”，甚至以“通敌资匪”的罪名治罪。兴隆六道河子一个老百姓生了病，弄点米熬粥喝了，不料在街上呕吐了出来，被警察看见有米粒，就抓起来审问，逼问从哪里弄到的粮食，被打得死去活来。

而群众的劳动所得则更是被搜刮殆尽。群众打下的粮食要交到“组合”名曰“谷物出荷”，棉花更是一斤一两不准存留，叫作“棉花出荷”。此外还有什么大豆、油类、报国、民主、部落之类的“出荷”。捐税更是五花八门，什么门牌捐、户籍捐、牲畜捐、飞机捐……另外还要献储金、献钢铁、献毛皮、血粉、鸡、蛋、菜、杏仁、栗子、核桃等等，捐税种类有增无减，滦平县的玻璃庙村，原有羊3 000只，在二年中被军警任意屠宰，只剩下 11 只了，可是征税时，仍然按3 000只计算。

在部落里，只有一样物资的供应最为充足，就是鸦片。群众的耕地被压缩到难以维持生命的程度，可是鸦片的种植面积却逐年扩大，“出荷”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而且规定，不交足“鸦片出荷”，就不配给生活物资。群众被剥夺了一切自由，而惟有吸毒不受限制。吸毒、扎毒针泛滥成灾，成年男子中一多半以上都吸毒，女人中也有很多吸毒。毒瘾大的就改扎毒针，随身携带注射器，隔着肮脏的破衣裤就扎，造成遍体烂疮，为此死掉的人不计其数。

敌伪为加强对部落居民的统治，设置了种种罪名，以使人民就范。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泄密犯、通匪、济匪、资匪等罪名，可以

随意加在任何人的头上。搜出几个信封，家有茶杯、小铁锅、灰色和草绿色衣服、衣服超过5个扣子、日落归家等，就被加上“通匪”罪；读四书会被说成“思想犯”，说上一句“我是中国人”，就会被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手电等物品，皆列为经济犯，治以重罪。最为残酷的是连年累月的“大检举”(即大搜捕)。

当敌人嗅到“集团部落”并未切断广大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时，于是便策划了不定期的“大检举”方针。他们将部落内八路军和地方革命干部的家属，甚至是无辜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弱全部逮捕。1944年大年正月初二，日伪军警在洒河兰旗营逮捕了几百人，关进牢房，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正月初八午后，才给每人两碗粥吃。军事法庭的日军就地过堂手持墨笔，在每个被刑讯逼问的鼻梁上点点，有红点有蓝点。谎说点蓝点的人释放，于是这些“蓝点人”被带到村外，用多挺机枪扫射，全部打死。这些“检举”，兴隆县被捕2 000多人，被打死400多人。1944年初，日军以近2万兵力“扫荡”我黑河川、黄崖等根据地，对整个“无人区”大搞“铁壁合围”，扬言要把“无人区”内每块石头都翻过来。我根据地居民牺牲3 000多

人，冻饿死1 000多人。中田村被“扫荡”11 昼夜，“检举”屠杀 200 多人。在成功村，敌人一次屠杀 30 多人，将死者的眼睛、心脏、生殖器都挖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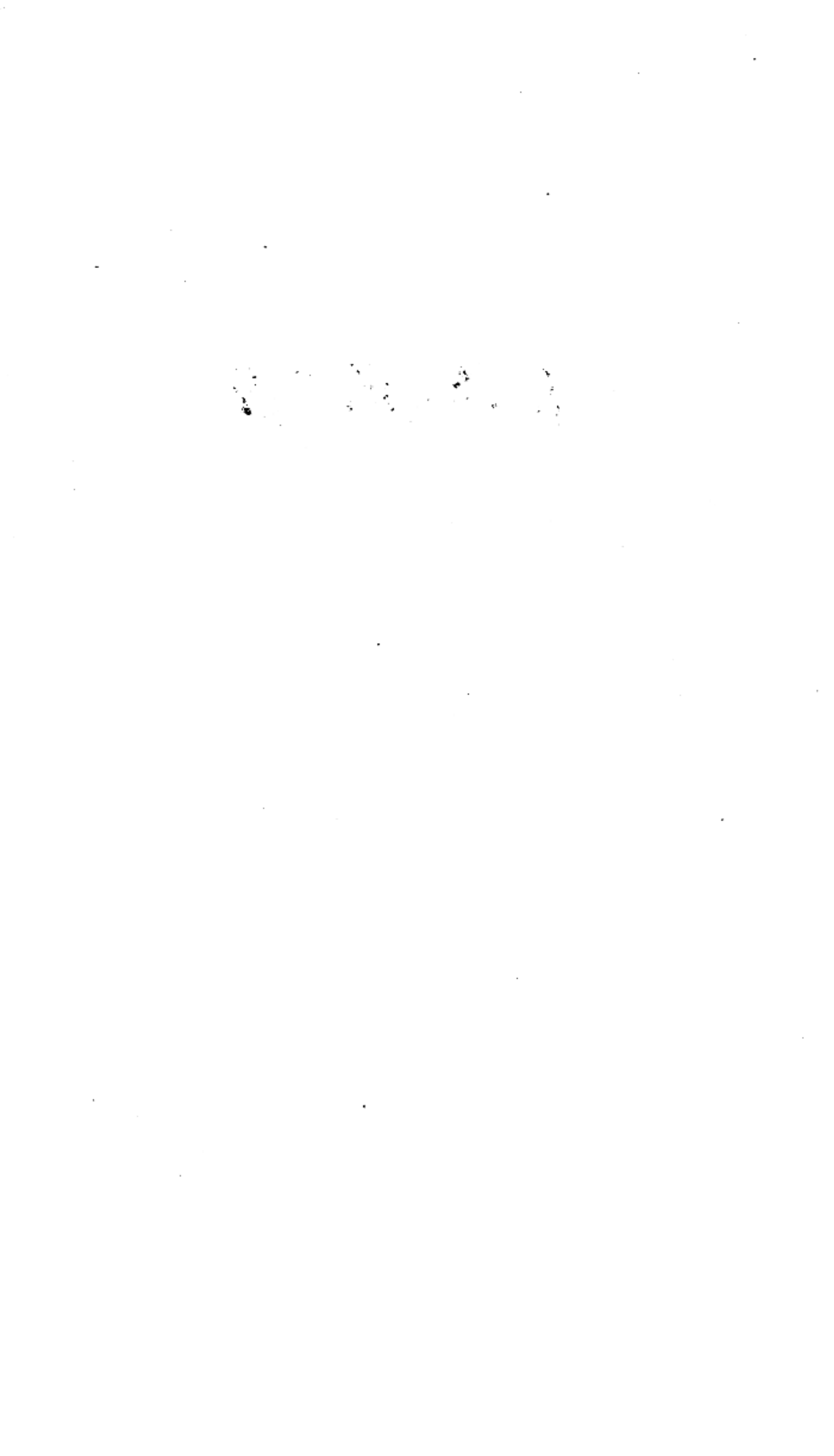
在 1944 年一年中，日伪进行了 4 次大规模的“检举”，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被逮捕和屠杀，有的被抓当劳工，发配到北满或日本服苦役，有的被秘密送到细菌研究所或武器试验场去当试验品，或者被弄到日本军队中做对新兵进行“胆量教练”的活人靶。兴隆县秋木林子和大莫峪两村共有 130 户人家，一次就被杀了 180 个男人，两个村成了“寡妇村”。而这样的“寡妇村”在长城线上又何止这两个！每个部落都有 1～3 个警卫室，备有刑讯看押的屋子，每天都有人被关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围墙的卡门更是妇女的鬼门关，每经过一次就要受到非人性的搜查，偶一反抗就要被关押在刑讯室内，受尽耍戏凌辱。被关押的人或被折磨致死，或忍辱自绝有的妇女还被迫为伪军警当妻作妾，成为这些败类发泄兽欲的性机器。在承德监狱，灌凉水、压杆子属于“一般化”的刑罚，而像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泼神经等酷刑就有十几种。1945 年夏季，日伪搞电刑试验，一次就杀死 300 多人。据统计，从 1943 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

37 690多人死在这座监狱中，这里成为残害中国人的大魔窟。承德西郊的水泉沟是最大的屠杀场和万人坑，常年有几百条野狗聚在那里扒尸吃，行人不敢接近这群吃红了眼的野狗，伪军警去埋尸时也得先鸣枪才能驱散狗群。兴隆县1933年3月被日军占领时，总人口约14万，到日本投降时，总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不足10万人。仅实行“集团部落”政策，大造“无人区”，全县被屠杀3.4万人，死于冻饿和疫疾万余人。加上极度困苦非人的生活，绝大多数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这就是所谓“王道乐土”的集家政策。

然而，凄惨残酷的“集团部落”和大造“无人区”，并没有使长城线上的人民屈服，他们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兴隆县成功村18岁的共产党员傅春，为掩护60多名乡亲脱险，跳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黄土坡村孙连举的妻子，为了不暴露集体目标，将怀里刚要哭的婴儿毅然地抛进山洞。黑河川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为了不拖累集体行动，自己躲进深山密林，在冰地上生下自己的孩子。山区人民经常用地雷、石雷与敌人进行“割青”与“反割青”的斗争。敌人来了，我军民拿起枪战斗，敌人走了，我军民又拿起锄镐生产。敌人割了大庄稼，他们又种早熟作物，敌人再割，他们再种荞

麦、萝卜。虽然人民生活是那样的艰苦——男人赤脚光背、身穿裤衩、头戴树枝帽，妇女穿着短裤，露着肩膀，但仍然坚持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一位老人的控诉



金庆范老人，经历了两次“归屯并户”，目睹了日伪当局的种种罪恶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以下是老人的血泪控诉。

离开家园

老人家世代居住在辽宁省本溪县一个小山村，这里山清水秀，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过得安静。“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这里宁静的生活，日军的炮火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膏药旗已经代替了青天白日旗，人们

都在猜测，这世道发生了什么变化。逆来顺受的人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故，对于城头经常变换大王旗早已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对于这次变故，人们也在天真地梦想，很快就会过去的，说不定哪一天又换旗呢。

然而，这次人们的算盘打错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了。伪康德3年(1936年)，日本侵略者下了“归屯并户”令，要求方圆5公里的散住的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心村落。

故土难离乃人之常情，要离开世代居住经营的家园，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下一步的生活怎么办呢？人们于是就迟迟不动，甚至天真地认为，我若不搬家泡上一个时期，风头过去也就没事了，你还能杀人烧房子吗？然而，这次他们面对的是日本法西斯，是一群已丧失人性的野兽，他们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击破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日本侵略军端着刺刀，举着火把开进了山村，不容分说，见房就烧，见人就赶。金庆范老人所在的小村一共43户人家，顷刻之间全部陷入火海。所有的房屋变成灰烬，寸草未留，就连屋里的物品也全都一并烧光。烧完房子的日军把人们驱赶到指定的村落，明令告诫，不准回去，如有再回到山村的，视为“土匪”，格杀勿

论。

金老人一家没有了家园，生存无路，没有丝毫办法，全家五口一路乞讨，来到了北大荒，最后落在伪三江省桦川县柳树河子村管辖的一个小屯。一家人实指望在这里能过上一个安定的生活，然而仅仅安稳了一年，桦川也开始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在这里，日伪政权首先给划出归并的中心部落，然后限定日期，将部落外的房屋全部扒掉，迁到部落之内，群众哪忍心扒掉自己几代人垒起的家业，便一拖再拖。然而，限期一到，日伪军警立即下屯开始焚烧。因这里是平原地区，信息比较灵通。各家一见火起，便知再也躲不过，为了减少损失。拿出屋里的东西，便自己上房开扒，一时间，唉声叹气，顿足捶胸，人们不得以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安乐窝。

圈住自己的围墙

日伪当局大搞“集团部落”，美其名曰防止“匪患”，让百姓安居乐业。实际上是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达到“匪民分离”。归并的屯子越大，“分离”就越彻底。因此，日伪军警把分散很远的小屯和农户归并到一起。金老人住的那片农户有一百零几家，分住在 11 个

居民点，这次除归到的那个中心屯以外，所有房屋全部扒毁。这些房子非常坚固，屋架是松木到顶，五檩五柁，一搂多粗的檩柁；墙框都是石头打底，上面垒“拉合辫子”，拉合辫是用草拧的，百年不烂。房盖大部是席子编笆，外苫羊草。这些的房子如不拆毁，几十年都可居住。许多富裕人家建的大院套，如秦奎君、姚连君、大门孙家、小门孙家、党花先生、徐豆腐房等也都被拆掉了，这是他们经营几十年才攒下的基业，全部化为乌有了。

而扒房子不是光扒掉不能住人就算了，而必须扒彻底，要把所有的墙框全部铲平，不能留一点断壁残垣，以防止“土匪”利用。小户人家的房子又少又小，很快可以铲平，而大户人家房子多而大，自己不能按期铲平，还得雇人帮忙，而盖的房子又异常坚固，很难扒，有的还得车拉马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干了一个多月，总算按期把房子铲平了。

被驱赶到“集团部落”的人们实指望马上建起自己的“新家”，然而人们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日伪当局规定，必须全力以赴修围墙，不能马上盖房子。否则，“匪民分离”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围墙是300~500米见方，壕深3米，宽3米。各家按劳力分段，限期完成。壕里面修3米

高围墙，4角修4座炮台，留东西二道门。围墙底层用土夯，上面砌草垡子。家有的草垡子不够用，还得套上洋犁到草甸子里去翻。草甸子里没有路可走而新翻的草垡子又异常沉重，即使一副洋犁套8~10匹马也拉不了几块。砌墙需大量的水和泥，全屯400多人一眼井，生活用水都极为紧张，所以用水得到1公里外的河沟里去拉。不光人力全力以赴，牲畜也得全部出动，地里的庄稼只能任其荒芜了。

在扒房子修围墙的同时，百姓还要修警备道，修“局所”（警察分所），修“望水楼”（瞭望塔）。警察分所还要修一个笆篱子，以便随时拘留“不良分子”。部落里一共百十户人家，成立了30人的自卫团，白天军事训练，把门站岗，盘查行人；夜晚放哨，防范“土匪”进屯。人们只能在这个“圈”里活动，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漏风的住房

归并的新屯，原来只有8户人家，几十口人。并户以后，一下子拥进来90多户400多口人。这些户近的二三里路，远的十几里路，家家携男带女、老老少少、鸡鸭鹅狗、猪马牛羊、锅

碗瓢盆、破瓶乱罐，全部挤进这个小屯，无处吃无处住。日伪当局就在空地上划了五条街道，每户分给一个房基号。极少数有钱的人家，很快在新房基上盖起了新房，而大多数既无钱又无势的人家，成天在修墙沟炮楼，哪有工夫盖房，只好用破烂木杆搭个窝棚。窝棚都是人字式的，两脚落地，没有墙壁，外面披上草，里面铺上草，这就是全家的卧室。至于箱柜、锅灶及其他家当，只得放在外面，再有草苫起来。锅灶，有材料的就支个草棚遮阳、没材料的就露天做饭。晴天还好过一点，一到雨天，窝棚上面漏水下面灌水，又没有墙壁，于是外面水多深，里面便多深水，所有家当都泡在水里。到了晚上，蚊子扑面乱咬，于是家家门前火光缭绕，都在点火驱蚊，否则无法入睡。

金老人家本就是外地户，家里更没有丁点家当，既盖不起房，又搭不了窝棚，只好住进一大户家的一座炮台。炮台上下二层，住着两家。炮台里面长3米、宽2米，里面只能住人，物品只能放在外面。炮台里面除了几个炮眼，没有通光透气的地方，又潮湿又黑暗，跳蚤臭虫到处乱蹦，咬得人浑身起疱，根本不能入睡。那年天公也不作美，雨水特多，麦秋以后天天下雨，院子里成了稀泥汤，又根本穿不起雨靴，大人小孩只

好光着脚出门，进门也只能用乱草把脚擦擦。而雨天做饭更是难上加难，上面揭不开锅，下面生不着火，只好由一个人拿着锅盖遮雨，一个人在下面烧火一个人在锅上做饭。到了快入冬时分，金家搬到炮台底层，搭了一铺土炕，以为可以睡个热炕不遭罪了，可有一天却把垒炮台的草垡子烧着了，两床仅有的破被头烧个囫囵半片，一件破棉袍也烧掉了半截前襟。

在围墙修好以后，地里的庄稼基本也收割完了，出“官工”也少了一些，于是人们这才有点时间盖自己的房子，否则过不去冬天。头等户要木料有木料，要草有草，要钱有钱。但没有劳力，大家都顾着垒自己的窝，所以，头等户也只能盖 3 间草房而已；二等户盖上 2 间草房；三等户盖个“马架子”；四等户挖个“地窨子”。即使上等户的草房也就比原来的窝棚多个围墙，高大一点罢了。大多数人家住的是“地窨子”，即先把房基挖下去半米深，周围用土垡子或泥垒起近二米高土墙，上面中间搪上一根木杆，两坡铺上秫秸，抹上泥，苫上草就成为住人的房子了。房檐太矮，开不了门，只得从房山开门，门旁留个窟窿，立两根木条，糊层纸，就是惟一的窗户。门，境况好的人家用木板门，有的钉个木框，用毛草勒上，有一些干脆就挂个草帘子过冬。

金老人家原打算租房干几年，积点家底再盖房，然而，现实情况逼得全家无处安身，总住人家的炮台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金老人的父亲带着当年13岁的他，一面在地里干活，一面上山砍木头，能盖房的木头得到10公里以外的山上去砍，砍下来晾几天，干一干再往回扛。父亲一人扛两根、小孩两个人扛一根，即使空手走，来回20公里也是很累的。何况肩上“满负荷”，真是苦不堪言。压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走一段歇一歇，肩头都压得红肿了。上山时带二块干粮，渴了找点山水喝。山上的水也不易找到，只得喝山下草甸子里的污水，污水上面浮着一层铁锈似的东西。由于常喝这样的锈水，再加上劳累，一家人都坏了肚子。父亲得了肠道病，一天十几次便血，没钱治病，向人家讨几个红皮鸡蛋蘸红糖吃，但根本不见效果还得坚持干活。就这样，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干了20多天，总算才把木头弄回来，扛完木头还得扛毛草。扛回来毛草，一家人不分白昼拧“拉合辫子”。有时白天父子几人还得去帮人家作工，以便挣点零用钱雇木匠和其他用场。就这样盖房、出“官工”、种地、打零工缺一不可，全家老小足足忙活一个秋天，才算盖了东倒西歪的两间草房。外边安上个板门，窗户弄几根木条立上，糊层纸；屋里也不

分里外间，锅台连着炕，墙上也没有抹泥。刚搬进去就赶上上冻，而墙框和上盖都没有干，所以冬天就变成了冰房，屋里周围全是白霜。晚上火炕烧热了，满屋潮气，被子湿漉漉的；到了下半夜屋子凉了，被窝里潮湿，而被面却冻成冰，漫长的冬季就这样一天天挨过去。

窝子病

这样的生活条件，一年四季的奔波劳累，屯子里的人纷纷病倒了，而到夏秋之际更是达到了高潮。开始是有些人闹肚子和头疼发烧，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常常是全家病倒，人们于是称这种病为“窝子病”。说是窝子病，其实不是指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的总称。多数是伤寒、痢疾，也有的是肺炎、重感冒，还有风湿病、更多的是妇科病。而最近的医院也在 15 公里以外的太平镇，镇上只有两家药铺，药铺里有几位坐堂医生。但能花得起钱治病的人却寥寥无几，于是要治病只好用些土办法，有人求人扎针、拔罐子、挑羊毛疔、挑攻心番、吃偏方等，有的请巫医“跳大神”，不少人死于巫医之手。一时间，屯子里鼓声（跳大神的羊皮鼓）不断，甚至通宵达旦；每天送殡的哭声连成一片，甚至一天几家

送葬。少数有钱人家还能买口棺材，多数人家只能弄4块薄板钉个箱子埋葬死者，而有些人家连薄板也弄不来，只好用祖辈传下来的旧衣柜把亲人埋了。

这场瘟疫，金家也无一幸免。姐姐得了伤寒，折腾了3个多月，总算死里逃生，活了下来，但一头黑发几乎全部掉光，浑身也脱了几层皮。

人是没有逃脱瘟疫的侵害、牲畜、家禽也因饲养条件的恶劣，环境的改变而多灾多病，大量死亡，尤其耕畜的死亡更给人们雪上加霜。

耕地撂荒了

归屯并户前，家家还有自己的耕地，无论是自有土地还是租种土地，基本都在房前屋后几百米范围之内。清晨，早早起床，干一阵活之后再吃饭，天黑之后再收工，最远走几百米的路。而住在部落里，城门不能早开，也不能晚关，以防“土匪”乘机闯入，不允许人们起早贪黑。所以农民要下地干活，早上得等到开城门，晚上要抢在关城门前回来。而土地又远离自己的家，近的二三里，远的七八里，午间还得送饭，不但耽误了农活，又浪费了劳力。于是地远的顾不上莳

弄，过去的三铲三趟，这时二铲二趟也保不住，造成农田大量荒芜，产量大大减少。

秋收时，过去可以把粮食背回家，而此时由于路远背不动，只好用人工换车工往回拉。来不及往回拉的，许多粮食被老鼠、野猪、狍子糟蹋了。租地户的情况就更惨了，除去交租和糟损以外粮食就所剩无几了，本来粮食就上年不接下年，这样一来就更加难过了。

并户以前地近，常上粪，土质肥沃都是好地，并户以后因近地好莳弄，有地户都选近地种，租地户种不着近地。远地，没牲畜种不起，种上也不够糟损的，所以只好不种地，专靠扛劳力、卖零工度日。而扛活卖零工也得有人多种地才有处干活。有些大户人家因地远不上算，也都大幅度减少耕地面积。并到我们那屯的农户，原来可以种 1.5 万亩地，而并户以后只种了6 000亩地。并户后第三个年头，日本“开拓团”在那周围建立 3 个部落，种的全是那屯的荒地。由于大户人家种地少、雇人少，再加上出劳工，穷人种地无法种，卖工没人雇，走投无路，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安，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我们那屯有家姓徐的，9 口人，5 个劳力，吃不上，穿不上，4 个成年小伙子娶不上一个媳妇。没有吃的夏天就吃野菜，老太太吃野菜中毒，脸上肿得

眼睛都睁不开。有个韩老大，老婆死了扔下4个孩子，小的送给了人，剩3个也吃不上，穿不上，冬天没有被，炕上抱一堆麦秸，晚上孩子们就钻到麦秸里面睡觉。还有个孙宝昌，两口子领3个孩子，5口人一床小破被。晚上给孩子盖，白天他围在身上当棉裤穿。这样可以出去干点活，维持一家不死。类似这样的人家不是个别的几户，而是大多数，至少占全屯户数的三分之二。

1945年解放以后，周围的开拓团日本人全部离开了那里，扔下了房屋、土地。屯里的农民陆续搬进了这些房屋，恢复了撂荒的土地才算结束了这场灾难。

凌源的“集家并村”



凌源县位于辽宁与热河两省交界地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33年3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凌源县。当地的人民与东北其他地方一样，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殖民地生活。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统治，不甘做亡国奴的凌源县广大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日寇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在凌源组建了县公署和警察署，还设立了村甲牌、保甲自卫等基层政权组织。日伪当局派遣伪满洲国国防军和伪警察讨伐队驻扎在凌源县。侵略者利用军警宪特

和伪政权机构强化其殖民统治，疯狂讨伐和镇压我军民的抗日斗争。1943年秋季，凌源县警察署讨伐活动于萧杖子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残酷地将4名被俘的游击队员杀害。为了恫吓凌源县的百姓，敌人砍下4名游击队员的人头，悬挂在凌源街小北口的高杆上示众。在侵略者占领凌源十几年的时间里，讨伐和屠杀从未间断过，大批抗日军民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抗日斗争的烈火也从未熄灭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配合全国的抗日形势，中国共产党冀热边特委和冀东军分区于1942年夏天，派遣主力部队，武装开辟热河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这一举动，日伪当局大为震惊，惊呼："延安触角已深入热河"。随即调集大批兵力对热河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与此同时，出于切断热河与冀东的联系、隔绝人民群众与八路军的血肉关系的罪恶目的，在锦州至热河铁路以南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

1942年起，日本侵略者在凌源县境内开始实行"集家并村"。所谓的"集家并村"，就是日伪当局在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选择战略地

位重要的村庄，将其确定为所谓的“集团部落”所在地，强迫当地和周围的居民在选定的地点修筑高大的围墙和炮楼。然后派出全副武装的“集家队”到周围的山沟里将几个或十几个村庄的群众强行驱赶到“集团部落”内居住。原有的村庄全部废弃，其房屋全部拆毁或烧掉，形成无人区，无人区内不准任何人居住。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其“集家并村”政策，对于不愿“集家并村”的多数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强迫百姓在限定的短时间内迁入“集团部落”。如稍有怠慢，其房屋、财物就会被一起烧毁，还要按“私通八路”的罪名予以严惩。

回忆当年的悲惨情景，三十家子镇裂山梁村81岁老人愤怒地叙述了那段苦难的历史。当年裂山梁村农民李有生和他的父亲、哥哥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劳动，积攒了一点家产，在“集家并村”时，因舍不得抛弃家里的坛坛罐罐，更舍不得拆掉亲手筑起的房屋，不愿迁入“集团部落”，日本军警将其一家3口活活打死，并恫吓周围的群众，谁若不愿搬进“集团部落”，“他们就是下场”。有个5岁小孩因患病不能随家人走，被伪军纵火活活烧死在屋子里，一个中年妇女看到这悲惨的一幕，因惊吓而死。当时，三十家子镇附

近的老百姓被强迫赶进一个面积约 15 亩地的“集团部落”。部落里只留南北两个大门，有军警站岗放哨。日出老高才开大门，下午日落时关闭。百姓定时出入，定时返回，如果回来晚了轻则遭到一顿训斥，重则只好露宿门外，甚至还要曹到毒打或被视为通“共”分子而被逮捕。

几个或十几个村庄的百姓同时汇集到一个“集团部落”，其拥挤不堪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迁移到“集团部落”内的群众根本没有真正的房屋居住。有的住马棚、牛棚，有的住碾磨房、仓房。连马棚、仓库都住不上的，就只好临时搭个“马架子”或草棚居住。由于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日伪军警又严加看守，不许随便出入，老百姓愤怒地称“集团部落”为“人圈”。

百姓被强行赶入“人圈”后，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生活没有着落。原有耕地多在 10 里或 20 里之外，耕种不便。被废弃的多数村庄已成了无人区。“人圈”内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有高大的围墙和炮楼，并有保甲自卫团武装日夜看守。“人圈”内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人畜混居。有的几家挤住一个畜棚或碾磨房，一个锅灶多家合用，甚至许多人不得不露天为宿。冬天大雪纷飞，常常有人冻死。青黄不接时节，因缺粮常有人饿死。夏天到处是粪便，臭水坑，蚊虫乱飞，

老鼠横行街头，痢疾、脑炎、伤寒等各种疾病迅速蔓延，甚至有的家庭全部因病死光。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2年至1945年，日伪当局在凌源县实行“集家并村”的地方有现今的河坎子、沟门子、三家子、天盛号、佛爷洞、刀尔登、杨杖子、三道河子、大河北、刘杖子、三十家子、小城子、万元店等十数个乡镇的偏僻山村。共修建100个“集团部落”。“集家并村”后造成的无人区面积为1500多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6%；被废弃的自然村436个，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20.5%；被强行赶进“人圈”居住的群众11 700户，人口70 000，占全县总人口的22%。被折磨致死的3 000多人；拆毁房屋65 600多间，烧毁房屋10 500多间；耕畜和猪羊等被日伪军警抢掠殆尽；各种财产、物质损失不计其数。

日本侵略者为支撑其侵略战争，除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外，还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资源。日伪凌源县公署从1936年开始征收“出荷粮”，“出荷粮”以单位面积估产为准。农民除留下少量的口粮、种子之外，其余必须全部被征“出荷粮”。“出荷粮”由“粮食组合”征收，不论年景好坏，都要按估产缴纳。遇上稍好的年景，交纳“出荷粮”后，还可剩点口粮；赶上歉

收年月，往往是交完“出荷粮”后就面临挨饿的现实。1943年“粮食组合”征收农民粮食，每公斤时币仅1角5分钱。除了粮食之外，还要征收其他物资，如当时规定，每甲要征收牛3头，羊7只，马皮1张，牛皮2张，猪皮5张，狗皮3张，洋钉和钢3斤，铁5斤，此外还有鸡蛋、猪血、牛油等。每年征收一次，每甲必须如数缴纳。除此之外，广大农民还要缴纳地捐税等各种苛捐杂税40多种。受尽压迫的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大量物资财富的掠夺，是靠贫苦的中国百姓作为劳动力资源，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日伪当局每年都要向百姓摊派劳工。每甲7至9人，每年2至3次。凌源县平均每年至少1万多人。大批劳工被送往北票、阜新、本溪、抚顺、鞍山、盘山、沈阳等各地，从事开矿山、修工事、种植水稻等苦役。广大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大多数劳工未得生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战线迅速扩大，侵略者深感劳动力资源的不足，为了其侵略战争的继续，伪满洲国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年龄在20至23岁的男青年，体检不合格不能被征国

兵者，即所谓的“国兵漏子”，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每年从事4个月的“国民皆劳”的无偿劳动。其实质就是变相增加劳工摊派。侵略者利用中国的劳工和“勤劳奉士”，生产煤炭、钢铁、粮食等重要物资，用于支撑其侵略战争。

凌源县的“集家并村”，以河坎子乡最具代表性。河坎子乡地处凌源县的南端，属辽西山脉地区，境内70%以上面积为山地。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这里当年是辽宁与热河的两省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既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要地，又是各种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

整个河坎子乡当时共有119个自然村，散居于面积为173.3平方公里的全乡各地。1942年春，日伪当局开始“集家并村”之后，全乡1 032户、5 524口人被分别赶进8个“集团部落”，即所谓的“人圈”（见附表1)。在这8个“人圈”里，仅因瘟疫流行被折磨致死的多达670人。西岭屯共有15户人家，75口人，竟有30口人死在“人圈”内，占全村人口近50%。再以沙果沟村为例，当时沙果沟村有62户、342口人，因“集家并村”摧残致死的有95人，占总人口的26.6%。其中因生活没有着落，乞讨无门，冻饿烧摔致死的有22人；因忧伤、饥寒、瘟疫致死的有65人；因住在旧房框、窑洞或往

返于部落与老家途中，被狼咬死的有4人。全村因“集家并村”造成的财产损失，计拆毁房屋355间，其中被烧的房屋225间，木柜190口，大缸260口，大牲畜58头，猪羊325头，大枪15枝。（见附表2）

从当年郑玉山一家的悲惨遭遇，可窥见“集家并村”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之一斑。1942年凌源县河坎子乡最早开始“集家并村”。当时的沙果沟村划归青龙县梨园部落。沙果树村距梨园部落二十多里路。集家并村时日伪军警宣布，谁不进部落就不给谁发“良民证书”。当时谁都知道，没有“良民证书”就无法生活。为了能够领到“良民证书”，百姓们不得不住进“集团部落”。郑玉山一家8口人，住在沙果沟村西大岭自然屯，生活很贫困，年复一年，勉强维持生计。“集家并村”使这个本来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弟兄俩商量，由弟弟郑青山带着全家户口和弟媳周氏、侄女玉兰住进“集团部落”，以便支撑门户，领取“良民证书”。郑玉山和老伴儿张氏，长子胡柱、次子小子、母亲韩氏，祖孙三辈五口人留在西大岭屯，也好方便耕地打柴。扒掉的旧房框不准居住，只好在岭前大南沟挖个土窑洞存身。

这年4月，抗日武装攻进梨园部落。惩办了

罪大恶极的日伪军警特务，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为贫困百姓出了一口气。此后不久，日本宪兵队带领警察讨伐队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抓不到“抗日分子”，他们就到处捕捉良民百姓。郑青山被当成私通八路分子抓进建昌县监狱。不久被敌人杀害。妻子周氏闻讯悲愤至极。当时气绝身亡。剩下玉兰只有 13 岁，只好回到祖母身边，与伯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穷得买不起火柴，多是由 15 岁的柱子到二里路以外的刘青家取火种，回到家后再吹火做饭。春秋季节天没变冷还算可以。到了冬季，天寒地冻，孩子身上没有衣服穿，取火种的困难就大了。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一场大雪过后，气温已达零下 20 多度。郑玉山把自己的破棉衣脱给胡柱穿上，叫他去取火种。谁知柱子一去再也没有回来。“集家并村”之后，村中人烟稀少，附近有十几个孩子被狼叼去。胡柱究竟是被狼叼去还是自己远走他乡逃命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一家人无衣无食，取来火种没有粮食。柱子前脚去讨火种，老奶奶领着玉兰和小子去冰沟，希望把一条破棉被托张武从给换点粮食来救命。待祖孙三人返回窑洞时，发现儿子郑玉山夫妇已经冻死了。三人极度伤心，抱头大哭一场，待哭到无力时，老奶奶领着两个孩子走了二里路，把

外孙刘青找来，就着土坎子掩埋了儿子和儿媳。勤劳一生的郑玉山夫妇，活着时受尽了苦难，死后光着身子而去。由于复土埋得薄，恶狼扒开复土将郑玉山的尸体给吃了。

老奶奶被逼得万般无奈，对玉兰和小子说：你们俩赶快去逃命吧！讨得一口饭吃。你们的父母没了，奶奶更没能力照顾你们了。老奶奶边说边把仅有的一个破被单扯开，交给孩子围在身上遮体。奶奶一边哭，一边送孙子、孙女儿上路。走了二里多远，送到石门子，身体支撑不住，倒在冰上，放声大哭。两个孩子围着奶奶哭，末了还是不得不离开奶奶，两人一边走一边回头望奶奶，直到看不见奶奶的身影，听不到奶奶的哭声……。两个孩子商量，先去北沟讨饭，但却看到北沟烟火连成一片，知道是日伪军警正在放火烧樏木棚子，两人不得不藏到土坎下面。待到天黑下来，他们偷偷进了村子。看到乡亲们都眼含泪水在烤火，两人只好又饿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乡亲们开始做饭，两个孩子讨吃了一点饭之后，再去香洼小河西部落讨饭。郑老七是该村有名的大好人。按辈份，他是玉兰的家族叔父。在香洼村给人做长工。看到可怜的玉兰，又想到本村董文一家的人品，就从中说合，把玉兰许给了董文的儿子董义三。从此以后，玉兰当了董家

的童养媳。剩下11岁的小子一人继续讨饭为生……

像郑玉山一家的悲惨遭遇，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旧中国，何止成千上万？

日伪军警大搞“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的目的是为了割断广大爱国群众与抗日队伍、与八路军的血肉联系，妄图以此消灭我们的抗日武装。然而敌人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想目的。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广大群众与我们的抗日队伍始终保持着联系。

1943年冬，日伪在喇嘛洞搞“集家并屯”，企图围剿抗日游击队。为了保护当时的八路军五区区长李惠安等人的安全，喇嘛洞村马玉堂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安排在山洞里，天天派人送饭。当李惠安等人决定暂时退回关里时，马玉堂又找到自己可靠的朋友当向导，并为他们带上半斗米的干粮。1944年3月，八路军两名伤员被马玉堂安排在自家附近的一个羊圈里养伤，他们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小铁锅做饭。没有药，就用干白菜水洗伤口。在马玉堂的精心照料下，两个月后伤员痊愈。其间不知躲过了敌人的多少次盘查，稍有不慎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然而为了亲人的早日康复，为了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他们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当两名伤员

要进关寻找队伍时，马玉堂又找到一个对进关路线熟悉的烟贩子当向导，安全地将两名伤员送到了目的地。1945 年初，马玉堂为八路军充当地下交通员的事情暴露了，日伪军警到处搜捕他。他有家不能回，只好住在屯外的羊圈里，用两根竿儿支起两个大笸箩当屋顶。忍饥挨饿，受尽了磨难。直到 8 月 15 日，日本鬼子投降，李惠友等 4 名同志接收了三十家子乡，建立了民主政权，马玉堂才重返家园。

程兴是凌源县河坎子乡河坎子村大西沟人，在日伪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明是河坎子香洼甲甲长，为日本人跑腿，暗地里却与八路军保持着密切联系。八路军冀东第七区区长马骥曾给他起了个化名叫“大青山”。他为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1942 年，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的马骥部队在青龙县冰沟一带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程兴积极与马骥部队联系，把香洼甲变成两面政权。马骥同志多次找程兴到沙果沟、北沟和冰沟等地开会布置抗日任务；程兴则经常给八路军收送军鞋、军粮，派人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支持八路军的抗战斗争。

1943 年 10 月，马骥部队袭击建昌县老达杖子警察分所。当部队路过大西沟时，程兴派抗日

积极分子、自己的族弟程锦去探听伪警察分驻所的情况。部队则在程兴家中休整待命。当摸清敌人的情况后，部队成功地捣毁了伪警察分驻所，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一次程兴和程志在黑夜去沙果沟接收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指挥员；为了安全，连夜将其送到大西沟杨树洼的一个黑土窑。受伤的八路军指挥员在土窑中住了七八天后，他们又在夜间将其转送到八路军军部。

1943年末，敌人终于发现了程兴的地下活动。为了稳住程兴，刀尔登伪警察署以开会为名将程兴骗至建昌县警务科，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其逮捕。后又将其送到热河省厅。在敌人的监狱里，程兴受尽了鞭子抽、扛子压、烙铁烫等各种酷刑。他浑身皮肉溃烂，惨不忍睹。但是，为了保护抗日武装不被暴露，程兴始终坚贞不屈，对于敌人急于知道的有关八路军的活动和人民群众抗日的情况只字不说，穷凶极恶的敌人意识到从程兴嘴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便将他活活地绞死。直至今日凌源人民一提到程兴，都被他的不畏强暴，为抗日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当年侵略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通过大规模的“集家并村”而建立的众多的“集团部落”，使无数的贫民百姓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被

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这只不过是侵略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之一。而凌原县的“集家并村”，又只是日本侵略者建立“集团部落”的一个缩影。

附表一

河坎子乡集家部落情况

项目＼部落名	香洼	小河西	北杖子	东台子	达魔洞	东沟	苏杖子	碾子沟
具体方位	乡政府所在地	西一公里	东北七公里半	东北十一公里	东四公里	东五公里半	东北四公里	西北二公里半
占地面积(亩)	30	35	30	44	40	26	40	45
围墙高(尺)	12	12	10	12	12	12	10	10
护沟深宽(尺)	4	4	6	6	5	5	4	3
大门数	南北二门	四门	东西南三门	四门	四门	东西二门	南北二门	东西二门
炮楼数	4	4	4	3	7	5	4	4
集人村数	12	8	6	13	5	7	8	6
备考	1.以乡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划分具体方位。 2.自然村有圈在部落里的，有集人外乡外县的，而与总数不相符。							

附表二

沙果沟集家并村调查情况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张耀	6	张耀	本人	61	当地首富，惊吓忧虑致死	瓦32间		32	10口	20口	7头	20头	枪7支
		郑氏	妻	53									
宋柏林	3	张氏	母	61	忧虑致死	瓦14		14	10	6		3	
张润	3	延平	父	68	忧虑致死	瓦9	9		7	4		7	
张珍	3					瓦10	10		7	6		7	
张贵	9	张贵	本人	62	忧虑致死	瓦38		38	20	15			枪2
张介林	6	常氏	母	65	忧虑致死	瓦20	3	17	12	12	4		箱6个
张铁林	3					瓦41.5	41.5		20	20	7		箱6 高桌40张
董风义	7	小六	弟	20	病饿致死	3		3					
董文	10					瓦8		8				5	
董风楼	8	曹氏	母	60	忧伤致死	4.5	3	1.5				6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董风延	3	李氏	母	57	饥寒遭难致死	2		2					
韩建贵	4	建贵	本人	55	饥寒遭难致死	3		3			1	2	
董风才	4					3		3					
张美	7					3		3					
张锦	8	包氏	母	71	忧伤致死	瓦11	3	8				7	
		文臣	长子	28	讨饭饿死								
		任氏	妻	56	忧伤致死								
张辅臣	9	张俭	父	56	有病 无食 无住处遭难致死	6		6			2	10	
		小三	弟	20									
林发	3	克荣	父	51	被讨伐队抓去毒打致死	3		3			1		
		张氏	母	46	被讨伐队打死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李青	11	李青	本人	50	忧伤致死	6	6				1	10	
李山	5	李山	本人	56	无吃无烧无住处遭难致死	3	3				1	10	
李永海	4	李永海	本人	50	忧伤病致死	3	3					5	
李永合	4	高氏	母	65	忧伤饿致死	5	5						
李廷	4	永中	长子	50	冻死	3	3						
		王氏	儿妻	45	瘟疫病致死								
		二头	长孙	10	给人家放羊被狼咬死								
李永成	4	永功	兄	42	冻死	3	3						
李中	3												
李永树	7	王氏	母	61	无衣无食致死	3	3				1	3	
		张氏	妻	23	回家采山枣被狼咬死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李汉	2					3	3						
李林	9	柴氏	妻	34	饥寒、病，居住条件差致死	10	10				3	10	
		永生	父	65									
		阎氏	母	64									
		李氏	弟妻	26									
李明	3	胡荣	女儿	6	病饿致死	2.5	2.5					5	
李树勤	6	李然	父	55	没吃、没住处遭难致死	2.5	2.5				1	10	
李歧	7	永年	父	68	被抓劳工致死	5	5				1	10	
		张氏	母	56	病饿致死								
		二头	次子	5	病饿致死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李树凡	6	张氏	母	61	在部落内贫困交加居住条件差致死	5	5					5	
		邵氏	妻	37									
李发	3	李发	本人	51	居住条件太差饥寒病致死	4	4						
		韩氏	妻	49									
		者子	长子	14									
		李旺	兄	63									
李儒	4	李儒	本人	65	衣食住太差，加上忧伤致死	3	3				5		
		陈氏	妻	65									
李瑞	4	李瑞	本人	60	进部落无衣食住致死	3	3						
		永臣	长子	24									
魏喜	7	董氏	妻	54	进部落无衣食住致死	3	3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董风元	4	石头	长子	5	在房框子后山被狼咬死	2	2						
董风雨	5	高氏	母	53	集家忧伤，饥寒病致死	2	2						
		董方	父	60									
赵峰	6	赵峰	本人	56	集家病死	3	3						
		杨氏	妻	51									
		俊明	长子	23									
赵俊臣	6	俊臣	本人	39	集家致死	9	9					21	
		张氏	妻	31									
赵连富	11	连富	本人	70	有病遭难死	6	6						
		赵文	长子	35									
董风中	5	兰桂	叔	60	有病遭难死	3	3					15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张武胜	6	张义	父	53	集家遭难死	6	6				1	10	
		尚氏	母	57									
		二头	长子	3									
张武林	5	武林	本人	30	集家外逃而死	2	2						
张武从	4	武从	本人	30	被讨伐队抓去致死	1.5	1.5						
		二丁	女儿	2	有病遭难死								
张武昌	2					1.5	1.5						
刘谦	5	唐氏	妻	60	集家后讨饭致死	7	7						
魏殿春	2					3	3						
郑海山	6	赵氏	妻	50	集家住窑洞冻死	3	3				1	8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郑玉山	4	玉山	本人	56	两口子冻饿同死在窑洞	1.5	1.5						
		张氏	妻	49									
郑青山	3	青山	本人	47	被抓到建昌监狱害死	1.5	1.5					11	
		周氏	妻	41	丈夫死后，忧伤致极而死								
郑老七	2	老七	本人	26	集家遭难死	3	3						
刘永富	7	永富	本人	48	集家有病、冻饿致死	2.5	2.5					16	
		荣头	三女	2									
刘宽	7	刘宽	本人	60	集家病饿而死	3	3						
		韩氏	妻	51									
		永中	次子	35									
		永国	三子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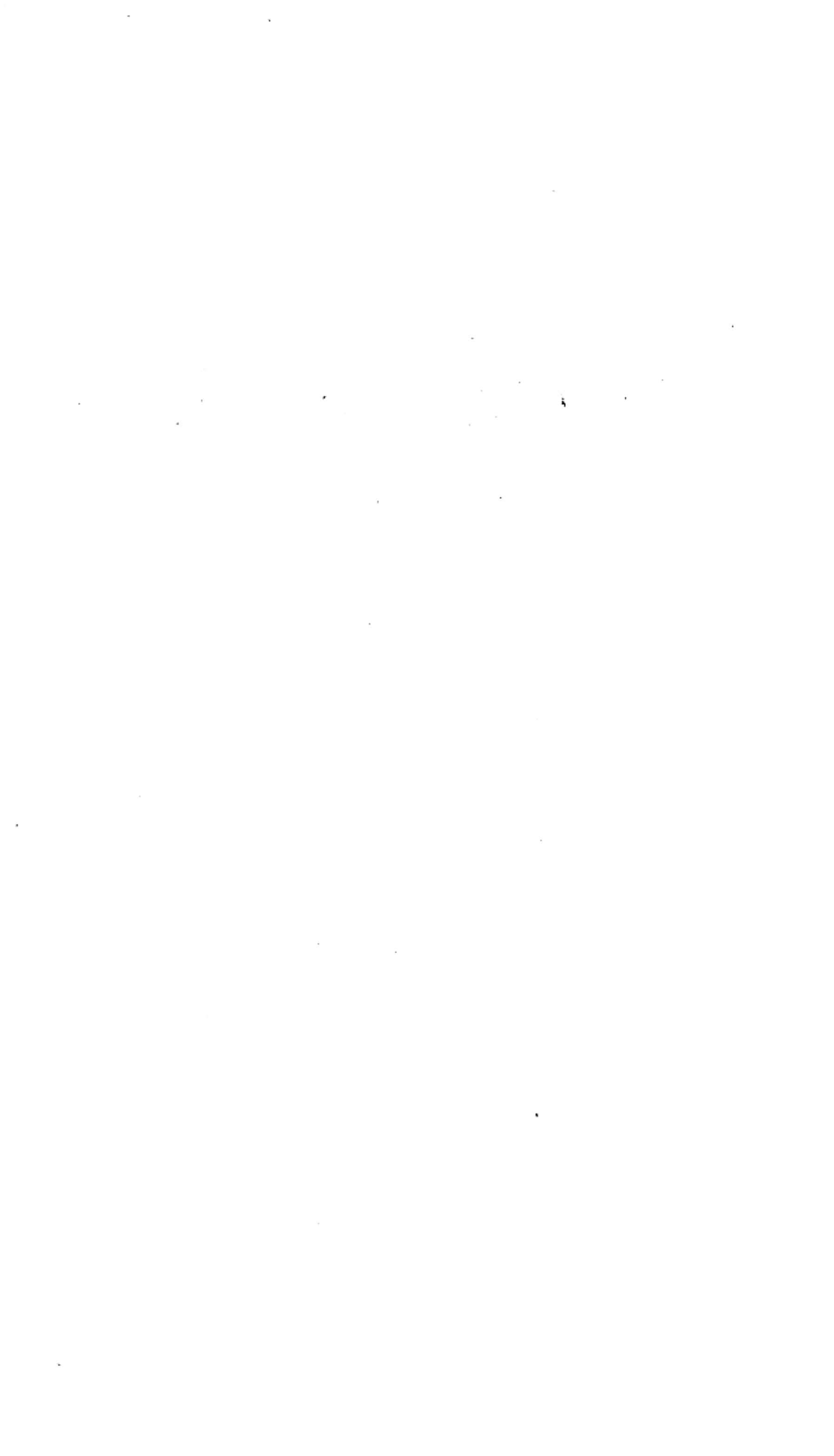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刘永贵	7	永贵	本人	60	集家病，加冻饿遭难死	2.5	2.5				3	10	
		郑氏	妻	51									
		三丫	女儿	4									
刘青山	2	青山	本人	45	集家病，加冻饿遭难死								
		张氏	妻	39									
刘永余	6	魏氏	母	70	集家病，加冻饿遭难死	3	3					23	
赵明	5	六头	女儿	5	在房框子外拾柴被狼咬死	2.5	2.5						
赵海	2	赵海	本人	56	集家遭难致死	2.5	2.5						
		马氏	妻	48									
赵玉臣	2	玉臣	本人	30	集家遭难致死饿死	3	3						
		赵氏	母	61									

续表

户主姓名	全家人口	致死者				房屋			财物损失				
		姓名	关系	年龄	死因	计间数	烧	拆	木柜	大缸	大牲畜	猪羊	其他
史景治	6	刘氏	妻	40	病饿致死	3	3				6	21	
		丫头	女儿	4									
孟景中	8	景中	本人	49	病饿致死	5.5	5.5				2	16	
		董氏	妻	53	有病饥寒　烤火烧死								
史景山	7	二头	次子	5	饿死	5.5	5.5				7	35	
		景山	本人	47	饿死								
		李氏	妻	41	饿死								

“归屯并户”的血与泪



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强行“归屯并户”，制造“集团部落”、“无人区”的过程，就是无数黎民百姓流血、流泪、葬送生命的过程。日本侵略军推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迫使无数的中国人民惨遭杀害。数以万计的房屋被毁。世代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百姓，在“归屯并户”后，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在日本侵略者“归屯并户”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百姓的斑斑血泪。

一

1937～1938 年，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桦南县进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在整个桦南县建立了 170 个“集团部落”。在这次大规模的“归屯并户”中，日本侵略者共毁掉村屯 120 多个，烧毁或拆掉房屋24 000多间，因无家可归冻饿而死或直接被杀害的群众13 000多人，因建立集团部落“被撂荒的耕地2 100多垧，损失牲畜4 800多头。

日伪当局计划将河北黑嘴子山屯归并到湖南营。一天，从湖南营来的日本人向河北黑嘴子山屯的人发出通告：全屯人必须在第二天全部搬家到湖南营去，如限期内不搬，就将房子统统烧掉。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整个屯子的人顿时乱了手脚，第二天傍晚，侵略者的限期已到，一辆满载日本大兵的汽车开进屯子。他们荷枪实弹，并拿着沾了汽油的火把，将全屯 27 户 32 间房屋全部点着。全屯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人们谁也不敢上前，直到日本兵走后，人们才哭喊着跑回屯里救火，从燃烧着的火堆里抢救衣物粮食，然而熊熊的大火早已将所有的衣物粮食烧掉。尽管房屋被烧，但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家园啊！全屯人仍

然没有搬进湖南营子，人们宁愿在烧毁的房屋废墟上搭棚暂住，也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可是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怎能按中国人的意愿行事？第二天下午，又开来一车日本兵，他们刚一进屯，见人就砍，把没有完全烧毁的房屋和人们刚搭起的小棚全部点着，彻底烧掉。从此河北黑嘴子屯变成了一片废墟。

1937年冬天，日伪当局到桦南县冷家沟进行"归屯并户"。数九寒天，勉强维持生计的百姓谁也不愿搬离自己的家园，怀着侥幸心理拖延不走。一天，满载日本兵的5辆汽车开进了冷家沟。跳下汽车的日本兵不容分说，将随车带来的汽油浇到所有的民房和柴草垛上，然后点燃。大火借着怒号的北风，越烧越旺，冷家沟顿时成了一片火海之沟。有2名年轻人眼看着自己家的房屋被烧，实在不忍心，闯进屋内抢夺生活用品，日军发现后残忍地将他俩用刺刀挑死。一位妇女生孩子不到两天，被日本兵硬从屋内拉出去，面对被火吞噬的房屋，这位妇女拼死命跑回屋内把孩子抢了出来。全村的百姓面对熊熊大火毁掉自己家园的悲惨景象，流下了悲愤的泪水。据说冷家沟的这场大火，足足烧了7天7宿，几十个自然屯变成了一片废墟。许多人在这次"归屯并户"中因失去家园，没有生活来源而冻饿致死，

仅仅是活活冻死的就有30多人。

也是这年冬天，日伪当局计划将桦南县南大甸子、碱草沟、东达连泡等村的零星散户迁往九里六屯。与冷家沟的农民一样，怕冬季受到饥饿和寒冷的遭遇，谁家也不愿搬迁，都想往后拖。日本侵略军看到农民不愿搬家，又采取同样的手段，烧掉所有的房屋，共计有500～600户人家的房子被烧毁。失去家园的农民被迫流浪街头。仅在迁往九里六屯的途中，就有许多人冻死在荒郊野外。据幸存的许庆祥老人回忆："腊月廿五，天特别冷，我去九里六屯的途中看到6个人冻死在一个大木柜中，"迁到"集团部落"的百姓，或搭起小草棚暂时安身，或借宿在别人的牲畜圈、碾磨房当中，甚至有的干脆露宿在柴草垛旁边。这年因冻饿而死的人就有100多名。

二

日伪当局大搞"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无人区"的主要目的就是割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是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敌人的"归屯并户"政策就越严酷。由于受到抗日武装的打击，1936年5月，伪滨江省公署召集所辖1市1旗、17个县的参事官，针对帽

儿山地区的“治安状况”，成立了哈东五县联合治安肃正办事处，即帽儿山办事处。为隔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办事处刚一成立，便强制推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1936 年 6 月，帽儿山办事处的所有日伪警察到蜜蜂村的南大沟“归屯并户”。日伪军警荷枪实弹，逼迫南大沟的群众到蜜蜂村大街上，然后将南大沟所有的房屋全部点着烧毁。日本军警恫吓群众：“南大沟里有抗日军队，在沟里住的人都要搬到蜜蜂村街上住，如果谁再住在沟内，就往沟里放毒瓦斯，把你们统统的毒死。”据幸存的人说，这次大火，南大沟村共有 120 多户房子被烧毁。1936 年 8 月，日伪武装警察到蜜蜂村、三于家、张家店、大青顶子、板子房、青龙山一带实行“归屯并户”，一次就烧毁 300 多户 700 多间房屋。

哈东五县联合治安肃正办事处在帽儿山地区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血腥政策，致使帽儿山地区蜜蜂乡的张家店、套子房、毕家沟、老爷岭等 56 个自然村屯和民房均被烧毁；使这里成了“无人区”。约有3 000户15 000人无家可归；共烧毁房屋6 000多间，荒芜的耕地12 000多垧。据当时的帽儿山办事处处长野崎茂战后承认：“为了制造‘无人区’，我曾命令部下烧毁了大量房屋，

仅在蜜蜂地区就烧毁了6 500多间。同时驱逐了大批中国和平居民，使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蜜蜂乡被毁灭村庄情况统计表

村屯名	户数	人口	房屋（间）	土地（垧）
张家店	80	300	155	350
喜家店	105	420	200	500
霍家店	70	250	140	280
老道店	140	500	280	540
三姓沟	30	120	60	120
刘焕沟	25	100	50	100
红旗杆庙	30	120	60	120
罗圈场子	23	90	46	96
棒锤砬子	27	120	54	103
大猪圈屯	40	160	80	160
套子房	36	140	70	140
东红石砬子	20	80	40	80
东五甲	20	80	40	80
将杆岭	30	120	60	120
西蜜蜂园子	40	150	80	160
东蜜蜂园子	65	260	130	260
西五甲	70	280	140	280
板子房	35	120	70	120

续表

村屯名	户数	人口	房屋（间）	土地（垧）
土山头	55	220	110	220
赵货郎沟	85	320	170	340
双马架	40	160	80	160
老母猪屯	50	200	100	200
三分所	27	90	50	108
献县屯	26	95	50	110
五甲东沟	90	360	180	360
老爷岭	80	320	160	320
彭老祖沟	36	140	70	140
金麻子沟	25	100	50	100
胡家沟	20	80	40	80
玉福亭沟	30	120	60	120
方家屯	26	100	50	104
迷魂阵沟	30	120	60	120
老佛堂沟	50	200	100	200
十三保	135	530	270	545
杨家街	50	200	100	200
夏家沟	60	240	120	240
老道沟	80	320	160	320
毕家沟	70	280	140	280
凉水泉子	80	320	160	320

续表

村屯名	户数	人口	房屋（间）	土地（垧）
老龙头	110	440	220	440
三股流	200	800	440	800
张家菜园子	30	120	60	120
三九天	23	90	46	92
半截河	120	450	240	480
土豆甸子	120	450	240	480
西红石砬子	40	130	80	160
红庙沟	20	80	40	80
北石场	30	120	60	120
扈家沟	30	120	60	120
大荒顶子	120	480	240	480
二荒顶子	100	400	200	400
扒火岭	80	320	160	320
张相厌岭	85	340	170	340
两撮毛	80	320	160	320
计 54 屯	3 219	12 585	4 101	12 948

此表摘自《东北大讨伐》，第 163 页。

三

今黑龙江省汤原县裕德乡（原名西二堡）距

汤原县城约35公里，东临乌龙河、南对大脑山、西至格节河、北靠庙岭山。在当年的西二堡西北约1公里处有一个被废弃的大井、人称"车家大井"。这个井里埋葬着40具无辜百姓的尸体。如今这废弃了60多年的古井边长满了荒草。看到那黑洞洞的井底，令人毛骨悚然。它在向人们哭诉着日本侵略者在西二堡地区"归屯并户"，制造"集团部落"的血腥罪行。

西二堡主要包括西二堡、于家沟、卯家街、毛家街、尚家街、高殿元等自然村屯。1936年日伪当局将西二堡改名为裕德，但人们习惯称其为西二堡。这里南北两面是大山，东西两侧是河流，地理环境比较复杂。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利用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经常在这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

为了围剿抗日武装，割断抗联六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日伪当局在西二堡一带强制推行了"归屯并户"政策。他们计划烧掉于家沟、毛家街、尚家街、高殿元、套子里等自然村落，在西二堡和卯家街建立"集团部落"，如有农民不愿搬家，就进行枪杀。

1937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从鹤立派来100多名日本兵与西二堡的300名日本守备队员汇合到一起。他们兵分两路奔向西二堡一带各自然

屯。西路日军从西二堡出来向南直扑高殿元屯，然后回经套子里屯，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敌人来到尚家街时，群众哭喊着“鬼子进屯了！”全屯的百姓顿时乱成一片。当时的于跃江家住在尚家街屯东。日本军警冲进屋里用刺刀挑开里屋门帘，把妇女和小孩逼到一边。于跃江的父亲、伯父、舅父则被绑上送到乔三矮子家里活活给烧死了。当时有70多名农民被关在乔三矮子、白桐林和老丁家房里，日本兵用大木杠将房门顶住。然后用机枪向屋内扫射。又将房子烧着，屋里的70多人全部遇难。留在院内的妇女和孩子，见到这种悲惨的场面，哭喊声响成一片，有的当场吓得精神失常。事后日本兵驱散了悲痛欲绝的妇女和孩子，逼着其余的男子，赶上马车，装着掠夺的物品，牵着牛，向鹤立和西二堡走去。

东路日军从南面的大脑山直奔于家沟、卯家街。鬼子进村，深夜里的谩骂声和“咚咚”的砸门声交织在一起，两个村的群众从睡梦中惊醒，人们还没等穿好衣服就被集中驱赶到李宗哲家的院子里。日军在院内架上机枪，将躲在屋内的人赶出来，逃跑的人也被抓了回来。群众被逼着站成两排，让人们亲眼看着，将所有的房屋点火烧着。日军还从人群中将赵景春等8名群众拖出，

毒打一顿，然后用铁丝把他们捆住并连成一串，连同从别处抓来的14人一道押往西二堡日本守备队。

东西两路日本军一阵烧杀抢掠之后，将抓来的共计32名群众关进西二堡日本守备队司令部院内。第二天清晨，日本守备队的军警宪特、伪自卫团全部出动，押着被捆在一起的32名群众，向北走去，大约走了两里地，来到了车喜云家多年不用的18丈深的大井旁。废井周围站满了日本兵。当时被绑的人两个被铁丝拧在一起。日军逼着被绑的群众走向井口，然后凶狠地用刺刀从背后扎进他们的胸膛，并直接将其挑进井里。32名被绑的群众无一幸免。刽子手们的刺刀都被我同胞的鲜血烫弯了，但他们却发出了野兽般的狂笑。当倒数第二个农民被刺时，他握住敌人的枪不放手，日本兵无奈连人带枪一起推进了井里。为了不失去这只枪，日军哄骗最后一名约12岁的男孩子：“用绳子把你送下去，把枪拿上来就放你回家。”当小男孩把枪拿上来后还没等站稳脚跟，日军就一刀刺进他的胸膛，然后挑进井里。后来又有8名群众被日军杀死后扔到了车家大井里。

四

日本侵略军推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政策，是伴随着极其残酷的法西斯暴行进行的。为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疯狂地制造“无人区”。对“归屯并户”中稍有反抗或不满情绪的人，进行灭绝人性地屠杀。如果发现所建的“集团部落”内有与抗日武装有来往，或给予物资支持的，就进行血腥的报复，其疯狂、残忍的程度，令人发指。

原汤原县四合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由于抗日队伍的宣传，小村里的百姓积极支持当地的抗日武装，当时的抗日联军经常来这里活动，并把该村作为秘密联络据点。

当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发现四合村的群众与抗联有密切关系时，便决心把四合村变成“无人区”，并准备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这里连“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的政策也不想推行了，一句话，就是要将四合村的百姓斩尽杀绝。

1936年深冬的一天，北风呼啸，冰封雪冻，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趁夜深人静之时，满脸杀气地摸进四合村。为了防止群众出逃，敌人对村

内通向外地的所有交通要道进行了封锁，手持火把将村内所有的房屋同时点着。刹那间四合村变成了一片火海，熊熊燃烧的大火映红了深夜的天空。四合村的群众在烈火中被惊醒，有的人刚刚逃出火海就被日本军逮捕，并被施以残酷的刑罚，最后全部遭到屠杀。有的来不及逃出火海则被活活烧死。据说四合村这次被火活活烧死的有60多人。还有些人从后屋逃走，因没来得及穿衣服而活活冻死。整个四合村的百姓几乎无一幸免。所有的房屋、粮食、家具等物资均化为灰烬。牲畜、家禽则被日军抢劫一空。四合村村民耕种的2 160多垧土地全部荒芜。从此这里变成了没有任何生机的寂寞世界。

现今在汤原县正阳乡南向阳村西2公里处，人们还能够看见一处荒草甸子，东西长520米，南北宽340米的村屯遗迹依然可辨。那就是被日军“归屯并户”后，又被日军烧毁的刘长永屯。当时的人称这次劫难为“火烧围子”。

1938年日伪当局在汤原县正阳乡西北沟地区推行“归屯并户”，附近各村屯都归并到刘长永屯，在刘长永屯建立了一个“集团部落”。该集团部落的长和宽为520米×340米。“集团部落”的四周修建了高2.7米，底宽1米的围墙，有东西两个大门。尽管“集团部落”内的群众受

着严密的监视，但是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与抗日武装保持着秘密联系，暗中支持抗日武装的活动。他们经常借外出之机给抗日队伍送衣、送药、送粮食。并经常为抗日队伍传送信息。同年初冬，西北沟地下党组织为了能使抗日联军战士在冬季来临之前穿上棉衣，安全过冬，便秘密发动屯里的群众，给战斗在北边山沟里的抗日联军第六军战士做60套棉衣。“集团部落”内的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给予积极的支持。有人的出人，有材料的出材料，不出几天的工夫，就完成了大部分棉衣的制作。然而就在此时，伪满警察发现了这件事情，并立即向日伪当局进行报告。为了报复并严厉打击百姓们支援抗日联军的行动。疯狂的敌人迅速包围刘长永屯“集团部落”。他们在村内架起机枪，封锁了仅有的东西两门，然后放起大火，将全村的房屋全部点燃。刹时间“集团部落”内浓烟四起，火光冲天。不到两个小时，小小的刘长永屯“集团部落”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为了威胁群众，敌人用刺刀将给抗日联军做了15套棉衣的赵裁缝活活扎死，还将与抗日联军来往密切的抗日救国会会员高福全等三人捆绑起来，塞进冰窟窿里活活淹死。百姓们受到血腥的屠杀，幸存的老弱病残者也被迫流离失所。从

此这里变成了一处荒草甸子。

五

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淳朴农民，世代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开荒种地，从事农耕，勉强维持着家庭的基本生活。日本侵略者出于消灭抗日武装的罪恶目的，疯狂地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强迫农民放弃耕地和家园，迁入毫无生活保障的"集团部落"，这是每个中国农民都无法忍受的。

当年伪滨江省东宁县暖泉子沟葫芦白崴的全体村民，面对"归屯并户"的通知，给日伪当局上交了如下所述的一份请愿书：

> 愚民等全体现在居住之葫芦白崴一带，为愚民等世居之地带，有四五百垧熟地，靠此土地以养活父母妻子，以至今日。但因时局关系，不得不迁移至集家部落暖泉子沟。愚民等事前不知，皆在梦中。无奈十五日前，代理副乡长吴昌清突然传来命令，愚民等始知，故全村民皆痛哭流涕，有如乳儿失乳。
>
> 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当此播种时期，来建设房屋，开垦荒地，实无以养活

父母妻子，故请体察愚民等之可怜，可否将迁移时间延迟至本年八月，届时一定移至指定地方不误。特此陈请，准许为荷。

滨江省东宁县暖泉子沟葫芦崴
全体愚民

这份请愿书，在凶残的日本军眼里能否奏效自然不言而喻。从请愿书上，让我们看到了“集团部落”政策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集团部落”的建立绝不仅仅是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实际上是断绝了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

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将抗日武装完全剿灭，采取了极为毒辣的手段，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对居住在“集团部落”的群众，严加看管。农民耕种的土地仅限制在部落周围，4 公里以外禁止种粮食，4 公里之内也不得种植可直接食用的农作物。农民种地要集体出工，集体收工，不得单独行动。秋收时节一到，必须核实田亩，颗粒归仓，严格防止农民藏匿粮食。为了防止抗日武装抢收地里的粮食，秋天农作物尚未成熟就迫使农民早早收割。收割后的粮食要由伪警察统一看管。

在“集团部落”周围通向大小城镇或“土匪”活动频繁的地区，不得有任何物资往来，严

格控制各种物品的商业流通。"归屯并户"变成"无人区"后，任何人不得在"无人区"居住，严禁向"无人区"携带一切物资。

日伪当局大搞"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大面积的"无人区"，对于消灭抗日武装、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确实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是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任何敌人的残酷手段也无法根绝这种必然的联系。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又将在东北推行的"归屯并户"、"无人区"的政策运用到长城和华北一带。但是无论怎样疯狂的敌人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都无法挽救他们最终失败的下场。